

日本出土唐宋時代陶瓷及其有關問題

謝明良

國立台灣大學

〔內容提要〕本文從觀察日本考古遺址出土的中國陶瓷標本著手，認為日方於七世紀末期已萌發對中國陶瓷的興趣，至八世紀前半更有相對多數的唐三彩輸入日本。結合中方的考古資料並參照文獻記載，可知日本出土唐三彩的種類偏向極有可能是肇因於當時日方獲得中國物資的主要來源，即聚集於揚州的陶瓷商品種類有關，而唐三彩可說是中國最早的貿易陶瓷之一。日本出土的九世紀晚唐陶瓷主要是浙江越窯系青瓷、北方窯系白瓷和湖南的長沙窯。其中越窯系青瓷主要由明州輸日，但北方系白瓷和長沙窯則多由揚州出港。雖然就整體而言，日本出土晚唐陶瓷種類仍與匯聚於各對日貿易港的陶瓷息息相關，但相對於揚州發現許多長沙窯，日本所見長沙窯數量則相對較少，推測除了和長沙窯本身的檔次等有關之外，似乎反映了日方已出現有限度的種類選擇。日方的品味選擇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趨於明朗，至遲在十二世紀前半已出現向中國定製符合自身需要的陶瓷，不過定製的種類或項目並不多，總還是以中方經常性赴日港口鄰近窯所生產的一般性產品為輸入的大宗，同時也曾針對這些窯場作品進行器形挑選。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的仍沿襲其於中國的使用方式，然而有些作品則被日本改變了原有用途，甚至被賦予了於中國未曾存在的象徵意義。

一、前言

自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病理學中山平次郎教授發表了其於九州採集得到的中國陶瓷標本以來，〔註一〕日本出土中國日本出土唐宋時代陶瓷及其有關問題

貿易瓷研究至今已近八十年。其間，七十年代由東京國立博物館主辦的《日本出土中國陶磁》特展，〔註二〕首次將日本全國許多遺跡出土的中國陶瓷標本齊聚一堂，更是開闢了人們的視野，可說是深入鑽研該一專題的重要里程碑。當時，日本遺跡出土有中國陶瓷的計八百處，而至八十年代中期已多達三千八百處，〔註三〕遺跡分布廣泛，所累積的標本件數也極為驚人。〔註四〕到了近年，更有約八千處遺跡出土了以中國陶瓷為主，但亦包括若干韓國、泰國和越南等地的貿易瓷。〔註五〕

面對這些個數龐大的遺跡出土中國陶瓷，同時在發掘報告書又大都不易尋得的情況之下，外國的研究者除了只能針對個別作品的產地或時代做些微弱的質疑，幾乎沒有插手的空間。反觀日方學者則累積了大量的研究業績，除了各地教育委員會等機關發行的調查報告書，或散見於各大學、博物館的學報和紀要之外，一九八一年起陸續發行的《貿易陶磁研究》年刊，更是集中反映了日本學者對於貿易陶瓷的研究成果及所較關注的課題。總括而言，日本多數研究者均能針對某一地區或地區內特定遺跡出土陶瓷做出具體而微的闡述，有的則針對某一時代或特定種類作品進行深入考察，當然也有少數研究者以宏觀的視野來觀察日本出土中國陶瓷所涉及的諸多問題。日本學者的研究業績提供了許多翔實的資料和有意義的論點，給了我甚大的啟發，但或許是由於論文撰述者有不少是身居前線的考古工作者，故論述的重點有時就偏向於陶瓷的精細分類、編年及原產地的比定等方面，而這一基礎資料正可提供外國研究者對於日本考古發掘報告書不易覓得檢索之某種程度的補救途徑。

宏觀的考察日本出土的中國陶瓷極易流於浮光掠影，日本學者多不輕易為之。然而以較寬廣的角度來思索該一課題，有時或亦可更清晰地觀察到中國貿易瓷輸日的整體趨勢，以及中日兩國人民對於這類陶瓷的對應態度或日本出土陶瓷種類與中國輸出港之關係等問題。以下本文即以日方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隨處比較日本的考古發掘報告並參照中國方面的出土資料，首先依時代綜觀日本出土的唐宋時代陶瓷的大致情況，進而總結其中的幾個問題點加以考察。我希望能透過這樣的敘述方式，使得本文在處理龐雜量大的考古資料時，還能掌握到中國陶瓷在日本出土的大體輪廓。

二、日本出土中國貿易瓷的起始年代及其問題點

如何正確地估計日本出土中國貿易瓷的起始年代，不僅涉及中國外銷瓷的起源這一重大課題，也與本文首先必須面臨的內容取捨息息相關。因此，有必要先就中日兩國早期文物交流以及日本出土或傳世之中國陶瓷的起始年代做一簡要的說明。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雖於漢代就和中國存在著正式的政治交往，福岡縣須玖岡本遺跡等彌生中期甕棺墓出土的玻璃壁，推測是紀元前後經由大陸傳入日本的，但目前仍未見日本出土漢代陶瓷的任何報導；六朝時期中日兩國持續交往並反映在日本出土的文物當中。如奈良縣新山古墳的銅帶飾推測是從當時中國江南地區輸入的，〔註六〕而日本古墳時代的馬具亦曾受中國的影響。〔註七〕屬四世紀後半古墳時代前期的京都大田南五號墳出土的分格規矩四神鏡，既印證了三國魏帝賜倭國女王卑彌呼百枚銅鏡的記載，〔註八〕山梨縣鳥居原古墳或兵庫縣安倉古墳等不少地區出土的對置式銅鏡則屬中國的吳鏡，後者被認為是三世紀時日本人民渡海到吳之會稽郡進行貿易的結果，吳的工匠甚至東渡日本鑄造所謂三角緣神獸鏡。〔註九〕另一方面，自邪馬台國女王臺與的西晉遣使以來一度中斷的中日政治交往，於五世紀的義熙九年（四一三年）倭五王（讚、珍、濟、興、武）再次遣使東晉向安帝貢獻方物，至劉宋昇明二年（四七八年）止計十次之多，在與南朝正式國交的同時，通過朝貢的方式進行貨物交換，《晉書》、《宋書》、《梁書》、《南史》等並載有倭五王的冊封記錄。〔註一〇〕

上述中日雙方的交往和日本出土遺物顯示，日本早在三世紀至五世紀時即對江南吳、東晉、南朝的文物有所理解並給予正面的評價。儘管如此，當時以浙江省為中心所燒製的高溫青瓷器，於中國江南地區不論墓主等級高低均普遍伴隨出土，可說是六朝時期中國南方最為流行的用器〔註一一〕，然而日本列島卻除了過去在愛媛縣松山市古三津山林砂崩時偶然發現的一件東晉青瓷罐這一非正式出土例之外，其餘遺址均未曾出土，也難怪有研究者形容該一現象是中國陶瓷輸入日本的歷史中開頭出現的一個謎。〔註一二〕自朝鮮半島江原道原城郡富論面法泉里二號墓出土的晉代越窯青瓷羊形器或著名的百濟武寧王陵出土的南朝青瓷和黑釉瓷，〔註一三〕朝鮮半島百濟地方出土六朝陶瓷遺跡已達十餘處。〔註一四〕姑且不論百濟所出作品是否確屬研究者所推測的中國賞賜品，〔註一五〕事實上也不排除日本今後出土的可能性，〔註一六〕或日本古墳時期若干器形與中國陶瓷的可能關聯，〔註一七〕但若就目前的發掘資料看來，似乎反映了當時日本對於中國陶瓷並未有太大的關心。結合六朝墓葬的出土情況，如果說這類經常被用來陪葬的量產陶瓷，於此時尚未大量進入雙方交往中的饋贈賞賜

品或偶一爲之的私貿易行列中，或許亦可視爲是自然之事。

推古天皇十五年（隋大業三年，六〇七年）聖德太子遣使赴隋，再度開啟了自倭五王遣使南朝不久即中斷的中日政治交往，唐武德三年（六一八年）高祖建立大唐帝國後，日本更多次遣使赴唐。自舒明天皇二年（唐貞觀四年，六三〇年）第一次遣使至寬平六年（唐乾寧元年，八九四年）菅原道真上書請廢止遣唐使，日本派遣唐使節計十八次之多。〔註一八〕值得一提的是，約完成於唐高宗（六五〇—六八三年），流行於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前半盛唐時期的唐三彩陶器雖亦曾於日本出土，但日方的研究者則一致認爲，唐三彩是經由遣唐使所攜回，屬非連續性質的朝貢贈賜品，故不能歸入貿易瓷的範疇。〔註一九〕其次，並以日本遺跡出土陶瓷種類數量和連續性，主張日本出土中國貿易瓷始於九世紀的長沙窯、越窯系青瓷、邢窯系白瓷以及若干廣東地區生產的青瓷，此即近年來以龜井明德氏爲主所提出的著名所謂初期貿易瓷的概念和實質內涵。〔註二〇〕由於該一觀點又與目前絕大多數的中外學者對於中國貿易瓷的起始年代觀一致，故普遍爲人們所接受。然而事實確是如此嗎？

截至目前，日本出土的包括中晚唐三彩在內的唐代多彩鉛釉陶遺跡近三十處，其中出土盛唐時期所謂唐三彩的遺跡估計至少有十八處之多。〔註二一〕出土分布雖集中於北部九州及奈良、京都畿內及其鄰近地區，但從神奈川縣平塚四之宮推測屬相模國府遺跡亦曾出土一事，〔註二二〕可知亦有少量的唐三彩被運往關東地區。日本出土有唐三彩的遺跡當中，以奈良市大安寺講堂南面地段燒土層所出作品數量最多，計有三彩枕殘標本二百片，估計復原個數可達三十件以上（圖一）。〔註二三〕衆所周知，做爲奈良七大寺之一的大安寺之實際營造負責人是道慈律師，《續日本紀》載道慈於大寶二年（七〇二年）隨粟田真人等遣唐使入唐求法，養老二年（七一八年）歸國後於天平元年（七二九年）做長安西明寺遷造大安寺於平城京，同天平十六年（七四四年）仙逝。基於上述情事，故自七十年代初期藤岡了一氏提出大安寺出土的唐三彩係道慈律師由唐歸國時所攜回的說法以來，〔註二四〕此一見解隨即由岡崎敬氏所繼承，〔註二五〕至今帶給日本學界不小的影響。我過去亦曾依據文獻記載，指出出土有唐三彩的大宰府觀世音寺之寺院營建者玄昉也曾隨養老元年（七一七年）遣唐使節入唐，而積極支持此說。〔註二六〕

姑且不論日本出土的唐三彩是否確由遣唐使節所攜回，我們並無任何理由僅僅依恃其可能的攜入途徑或參與者的身分，逕自斷言唐三彩的屬性。因此，我擬從檢討日本出土的與唐三彩同時或稍前稍後時期的中國陶瓷著手，進而結合其他國家出土例，提出看法。原藏於奈良法隆寺的青瓷盤口四繫壺是做爲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一件傳世器爲人們所熟知（圖二）。歷來雖有學者主張其應爲六朝南方某地瓷窯所生產，〔註二七〕不過經由近年龜井明德氏結合中國方面出土例的詳細考證，基本釐清了該作品應是七世紀前半福建地區所燒造，並且有可能是由僧人福亮將之當做裝盛丁香香的容器傳入日本的。〔註二八〕值得留意的是福岡平和台（鴻臚館址）既曾採集到類似造型的青瓷盤口壺殘片；平城京左京八條三坊東市旁東北部（SD1135）地點亦曾出土推測屬七世紀後半的青瓷四繫罐。〔註二九〕此外，除了七十年代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調查奈良縣高市郡明日香村大官大寺址，與七世紀後半日本陶器伴隨出土的褐釉陶片是否確屬中國產品尚待證實之外，〔註三〇〕平城京左京三條四坊十一坪出土的白瓷獸足圓形硯，從其造型而言極有可能上溯七世紀後半。〔註三一〕現藏道明寺天滿宮傳爲菅原道真生前所使用的白瓷滴足圓硯，雖曾一度被認爲是唐代所謂昌南窯作品（圖三），〔註三二〕不過從圓硯的造型作風推測，當今學者多已修正前說，同意其年代應在七世紀中期。〔註三三〕並且有可能是山東地區的瓷窯所生產。〔註三四〕因此，儘管資料仍極有限，卻也透露出長久以來可說是呈空白狀況的中日陶瓷文物交往，至七世紀中後期情況似已有所改變，這從上述日本傳世文物的年代檢討，以及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均不難窺測得知。

如前所述，日本出土有盛唐三彩的遺跡近二十處，而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所謂唐三彩約完成於唐高宗時期（六五〇—六八三年），流行於七世紀末至八世紀中期，安史之亂（七五五—七六三年）後明顯趨於沒落。相對的，就可確認器形或裝飾特徵的日本遺跡所出唐三彩而言，筆者同意其絕大多數作品均屬日方學者所指出的八世紀前半時期作品，另從奈良縣日神龜六年（七二九年）小治田安萬侶墓出土的日本自製模倣唐三彩之奈良三彩器，〔註三五〕可證實唐三彩至遲於八世紀二十年代就已傳入日本。然而，日本出土唐三彩的確實年代既涉及了日本於何時開始大量接受中國陶瓷，以及唐三彩本身的編年問題，或許還是探討中國貿易瓷起源的重要線索，故值得特別加以留意。如八十年代發掘的三重縣繩生廢寺塔基壇舍利穴出土的唐三彩印花碗（圖四），〔註三六〕從廢寺遺址出土的屋瓦編年等看來，該寺約建於七世紀末至遲在八世紀初，故建

塔前置入覆蓋於舍利容器上的三彩碗亦不應晚於這一時期。〔註三七〕繩生廢寺出土作品提示了唐三彩輸入日本的年代或可早自七世紀末，使得以往研究者認為日本出土唐三彩均屬八世紀前半作品的說法有修正的必要。事實上，我過去亦曾針對宗像郡沖之島祭祀遺跡出土的三彩貼花長頸瓶（圖五），結合出土有同類作品的山西省金勝村三號墓之墓葬構築，及伴隨出土的其他陶瓷之相對年代，認為金勝村三號墓的年代應在七世紀末，不能晚於西周時期（六八四—七〇四年），故沖之島遺跡出土的三彩瓶之實際年代亦相當於這一時期。〔註三八〕雖然唐三彩的精密編年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不過從湖北嗣聖元年（六八四年）李徽墓出土的可能做自金銀器的三彩印花龍首杯和角杯推測，〔註三九〕類似作風的三彩印花杯形器的存在時代有不少或可上溯至七世紀末期。另一方面，平城京左京七條二坊六坪〔註四〇〕和右京五條一坊十五坪均出土了造型相異但同屬杯類的三彩印花標本。〔註四一〕由於中國紀年墓或可精確判明其相對年代的墓葬或遺址極少出土唐三彩器皿類，因此我們雖有理由認為前述平城京遺址出土的印花杯的時代或可早自七世紀末，卻也無法斷言三彩杯形器僅只存在於這一時期。不過七十年代報導的奈良盆地龍田川斑鳩町三號墓（御坊山三號墓）出土的三彩陶硯或許可為探討該一課題提供若干的線索（圖六）。〔註四二〕有關御坊山三號墓三彩硯的產地歷來有所爭議，有中國說和朝鮮半島輸入說等兩種說法，〔註四三〕但從近年來學者對於該硯的胎釉、造型和裝燒方式的專題檢討，以及將之置於中國圓形硯之發展脈絡中的總合考察，均表明該三彩硯有較大可能為中國所生產。〔註四四〕其次，從硯的造型特徵以及伴隨出土的玻璃管飾之年代，可推測應屬七世紀中期或稍前時期作品。〔註四五〕如前所述，從法隆寺青瓷四耳罐等傳世作品的確實年代，以及若干遺跡出土的屬於七世紀的中國製青瓷和白瓷，我認為長久以來未能進入中日文物交流行列中的陶瓷，於七世紀中後期情況已有所改變，而該一推論亦可從繩生廢寺所出唐三彩印花碗的時代及部分經由造型或裝飾特徵等比較資料可判斷其相對年代的七世紀末唐三彩標本得到必要的驗證。

然而，問題是我們能否依據上述出土作品來做為中國輸往日本貿易瓷的早期例證？儘管我不能完全同意目前學界所普遍認知的貿易瓷必須具備的連續性特質，但唐三彩的屬性既涉及了中國貿易瓷的起源問題，茲事體大，有必要對此略作考察。大體而言，學界之所以一致主張中國貿易瓷始於九世紀，除了是因考慮到出土有較多唐三彩的日本有多次派遣遣唐使之舉，

還肇因於主要流行於八世紀前半的唐三彩的出土數量既較少，不能與九世紀始大量輸出的其他瓷窯相提並論。再者兩者之間也存在著時間落差。就日本出土可確認屬七世紀末至八世紀中期的所謂唐三彩而言，多數遺跡出土數量雖少，但出土遺跡已達近二十處，其中，大安寺講堂出土的三彩枕估計可達三十件。相對的，被視為中國貿易瓷代表品種的湖南長沙窯作品，於七十年代中期為止共發現八例，【註四六】至九十年代經正式報導的遺跡累積至近四十處。【註四七】暫且不論日本出土長沙窯數量不多是否與長沙窯作品所呈現的西亞裝飾作風而未能受到日本的歡迎一事有關？【註四八】考古發掘表明，日本遺跡長沙窯的出土頻率雖高於唐三彩，但仍未形成足以說明兩者作品相異屬性的絕對差距。

由於流行於七世紀末至八世紀中期的唐三彩，似乎與九世紀初始大量外銷的中國其他高溫釉瓷之間有所間斷，故研究者遂以該一非連續性質做為判斷唐三彩是否為貿易瓷的另一依據。因此，以下有必要在前述考察唐三彩於日本出土頻率的基礎之上，檢討日本遺跡出土陶瓷所謂斷層問題，從而推測唐三彩的性質。就我所能掌握的資料而言，已有部份遺址可從層位、共伴遺物或文獻記載具體地估算出土中國陶瓷之相對年代，其中即包括若干以往被視為空白階段的八世紀後半時期作品。如九州大宰府藏司跡南側（一九八一年度第七十六次調查，SD320）最下層【註四九】、大宰府政廳後背地遺跡（一九八六年度第一〇二次調查，SX2999）（圖七）【註五〇】、觀世音寺僧房遺跡（一九八六年度第四十三次調查，SE108）【註五一】等均出土了該一時期越窯系青瓷作品。其次，大宰府左郭五條五坊（一九八一年度第十九次調查，SD80上層）【註五二】、大宰府左郭五條一、二坊（一九八二年度第八十次調查，SX275）【註五三】、大宰府右郭六條三坊（一九八四年度第八十八次調查，SE251）【註五四】等屬於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前半遺址也都出土了越窯系青瓷標本。青瓷之外，福岡市南區柏原M遺跡（SD02）以八世紀後半為主的最下層出土了白瓷碗，【註五五】近年來更有人將同遺跡伴出的長沙窯水注的時代提前至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中期。【註五六】屬八世紀後半層位出土長沙窯的實例還見於前述大宰府左郭五條五坊遺跡（SD080）【註五七】，然詳情不明。總之，就這一時期出土的中國陶瓷種類看來，以浙江省越窯系青瓷佔絕大多數，但亦包括若干推測屬北方窯系的白瓷，以及詳情尚待確認的湖南長沙窯作品。

事實上，日本遺址不僅出土了盛唐三彩，亦出土了部分屬於九世紀或具體年代極難確認的所謂晚唐三彩。其中如三次市

備後寺町廢寺出土的被推測屬晚唐五代時期的瓶或壺殘片，【註五八】其施以褐、綠色釉並飾白色斑紋的作風，與盛唐三彩之施釉技法頗有共通之處，故其年代或可上溯盛唐或稍晚的中唐時期。其次，大宰府大字觀世音寺境內出土的可能是三足鍍口沿身部的三彩貼花殘片，因模印貼花紋較一般所見盛唐同類作品略顯呆滯且形式化，故報告者推定其時代約為盛唐晚期或更晚。【註五九】雖然資料仍極有限，日本部分遺跡出土三彩釉陶的編年亦有待釐清，不過綜合以上敘述，可以初步得出結論認為，中國陶瓷自七世紀末被少量攜入日本以來，至九世紀起中國貿易瓷大量輸出，其間並看不出有明顯的中斷跡象，八世紀前半日本遺跡出土的中國陶瓷雖以唐三彩的出土頻率最高，但亦包括部分青瓷和白瓷。其實，由於缺乏紀年資料，有關八世紀越窯系青瓷的編年研究及風格確認目前仍未有效地展開，故日本遺跡所出九世紀的作品中是否包含有八世紀標本，仍需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註六〇】無論如何，日本出土八世紀中國陶瓷中的青瓷和白瓷既是九世紀始大量輸日的主要品種，部分可確認屬九世紀時期的日本出土晚唐三彩或亦可視為是八世紀時期日人喜好唐三彩之品味的沿續。八世紀中國陶瓷在日本主要分布於當時日本對中的門戶大宰府及政經所在之京畿地區，至九世紀始才逐漸擴大分布。但無論是從沿續性或出土頻率等來看，唐三彩無疑是屬於廣義貿易瓷範疇，並且也唯有將之視為貿易瓷才能理解為何除了朝鮮半島以外，【註六一】埃及的福斯塔特（Fustat）【註六二】或東南亞泰國【註六三】等地會出土有唐三彩。日本遺跡出土的八世紀中國陶瓷資料，提供我們重新考慮以往中外學者主張中國陶瓷外銷始於九世紀看法的重要線索，【註六四】並將中國貿易瓷的起源提早至八世紀前半【註六五】。至於日本傳世或出土的七世紀中後期中國陶瓷，其發現頻率和數量均較少，而若將法隆寺傳世的青瓷壺或道明寺天滿宮的白瓷硯等可推測其大致產地作品，結合目前所知該產區瓷窯生產性質及可能的銷售情況，估計不會屬於貿易瓷範疇。

三、日本出土的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陶瓷

九世紀晚唐時期中國陶瓷外銷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階段。除了日本和朝鮮半島之外，東南亞和西亞的許多國家或地區都出土了這一時期的中國陶瓷，數量也顯著增多。其主要內容包括越窯系青瓷、湖南長沙窯青瓷和推測屬北方窯系的白瓷等。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各地區所出陶瓷大體屬上述瓷窯系作品，也就是說似乎看不出有隨著地域的不同而出現相異陶瓷的現象。不僅有部分遺跡同時出土了以上三類陶瓷，朝鮮半島慶州市拜里出土的收納火葬骨的長沙窯雙繫罐，其上甚至於覆以反扣的越窯系青瓷鉢以爲罐蓋。〔註六六〕就是因爲不少遺跡存在著上述三類陶瓷的共存組合關係，以及各地區遺跡出土中國陶瓷種類的一致性，因此近年來研究者在總結各地遺跡出土資料的基礎之上，得出各國輸入的唐代陶瓷並無所謂的個性的結論，〔註六七〕亦即主張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家於當時接受中國陶瓷時並無獨立的選擇權，而只能是全盤地接受中方的輸出。〔註六八〕我認爲，晚唐時期中國貿易瓷及其與國外市場消費互動關係的估算，既涉及中日雙方的貿易態勢和日方品味撰擇之存在與否這一貿易陶瓷研究上的重要課題，也與如何地去看待並圓滿地解釋日本出土唐代陶瓷的諸多現象息息相關。故以下擬在日本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參照中國考古發掘資料，首先整理日本出土的晚唐五代陶瓷，以便與其他國家中國陶瓷出土例進行比較。

截至目前，日本出土有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的越窯系青瓷遺址至少達二百餘處，〔註六九〕但若依據八十年代由龜井明德氏針對已正式報導的一二五處出土越窯主要遺跡的綜合論述，越窯的分布以九州最爲集中，次則爲關西地區，關東地區僅八處出土，其中又以北九州福岡市大宰府鴻臚館遺跡這一對中交易據點所出數量最爲龐大。就遺跡性質而言，以官衙、集落、寺院佔多數，屬於墓葬性質的只有九處，僅有一處屬祭祀遺跡。〔註七〇〕作品可分爲精粗二類，均以碗盤類佔絕大多數，然而除了鴻臚館遺跡出土相當數量飾刻劃花紋的精品之外（圖八），集中出土於大宰府史跡和福岡地區的粗製越窯青瓷〔註七一〕，幾乎不見刻劃花或鏤空裝飾者，說明了輸入日本的越窯青瓷大多屬次檔品（圖九）。雖然如此，從出土遺跡性質推測其使用階層多爲寺院、官衙，而九州地區則又包括了當地富豪之輩，〔註七二〕但不排除庶民亦能使用的可能性。〔註七三〕

衆所周知，歷來對於所謂越窯的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隨著近年來中國方面的窯址發掘調查的進展，中方學者多主張越窯主要是指杭州灣以南上虞、紹興、余姚等地瓷窯作品，並不包括溫州地區的甌窯或金華地區的婺窯。〔註七四〕相對之下，日方除了少數研究者表明自身對於越窯定義的理解和所採取的立場，〔註七五〕絕大多數的報告書並未對此做任何的交流。

代，而逕自採廣義的越窯概念，將越窯與浙江青瓷相同。就日本遺跡出土所謂越窯或越州窯比照中國方面的瓷窯考古資料，其絕大多數雖屬狹義的越窯產品，但如平安京左京四條三坊（SEI）出土的線刻裝飾杯可能屬鄞縣窯所產。【註七六】其次，福岡縣久留米市西谷第一號火葬墓出土的青瓷褐斑壺【註七七】或紫筑野市大門遺跡出土的青瓷褐斑執壺（圖一〇），【註七八】過去曾依據其於釉下施化妝土及褐斑裝飾而將之定為長沙窯作品，【註七九】亦曾從胎釉特徵推測屬越窯產品。【註八〇】然而無論從胎釉、褐斑裝飾或施化妝土的手法等特徵，極有可能是浙江金華地區所謂婺州窯所產。【註八一】揚州市史可法西路北側教育學院也出土了與西谷火葬墓褐斑壺造型、胎釉或褐斑均極為類似的作品，報告書雖將之歸入長沙窯，【註八二】但可從壺外底處五支燒痕等推測其應屬唐代婺州窯系作品。【註八三】揚州出土有婺州窯一事是值得留意的現象。此外，也有人主張京都御室仁和寺圓堂跡出土的盒（圖一一）、宇治市淨妙寺跡的執壺、京都市七條唐橋西寺跡出土的燈盞或京都上京區北野廢寺跡的碗等青瓷作品，屬浙江東南沿海台州地區所生產的所謂台州窯作品。【註八四】故日本出土的所謂越州窯作品除了杭州灣以南狹義的越窯之外，極可能還包括若干金華地區婺窯及台州地區的青瓷作品。

與越窯同時出現於陸羽《茶經》的北方邢窯白瓷，在晚唐李肇所著《國史補》中已有「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廣大消費市場。依據近年來的調查資料，【註八五】日本列島至少有近二百處遺跡出土了所謂的邢窯系白瓷（圖一二、一三）。遺址性質包括了官衙、寺院、集落、邸宅，但個別的火葬墓中亦可見到。其遺址性質和分布既與日本出土的越窯大體相似，大多數遺址作品亦與越窯共伴出土。日本出土的所謂邢窯系白瓷器形以碗類佔絕大多數，造型一般呈唇口、璧足，可分精粗二類，精者胎釉俱佳，釉色瑩白，除底足著地處外均施釉；粗者胎施化妝土，外底心無釉。【註八六】底足呈璧形的陶瓷於中國約出現於八世紀中期，流行於九世紀前半，以後則逐漸衰退而為圈足取而代之【註八七】。結合日本遺址所屬可能之相對年代或依據伴出的越窯之編年，基本可以確認日本所出玉璧足白瓷碗多屬九世紀遺物。

儘管中國方面的窯址調查表明，唇口璧足白瓷碗是以邢窯為代表的北方窯場經常可見的器類之一，【註八八】然而日方學者因顧慮到輸入日本且可確認產地的中國早期貿易瓷極少見到北方窯系作品，故歷來有不少研究者對於該類作品雖採取「邢窯系白瓷」的稱謂，但實際上卻又主張其應是華南瓷窯所生產，【註八九】甚至暗示其產地可能在廣東地區。【註九〇】就

中國窯址調查資料而言，雖不排除南方出土的若干晚唐至五代白瓷有可能為當地所產，〔註九一〕然而經確認的時代最早的南方白瓷窯只能上溯至五代時期，至於被懷疑或為南方所產的幾件作品，其器形或胎釉特徵亦與日本出土標本不同。日方學者認為晚唐時期華南地區或曾存在可燒製大量優質白瓷的窯場之臆測，或許反映了他們嚴謹的治學態度，但是日本平安京西寺跡等遺址所出作品，其實與邢窯窯址標本於器形或胎釉特徵完全一致（圖一四）。〔註九二〕故若僅僅是基於北方陶瓷對外運輸不便的經濟成本考量，來做為產地釐測的主要依據，顯然不足以令人信服。其次，五十年代廣州大中十二年（八五八年）姚潭墓曾經出土同類白瓷碗一事，〔註九三〕恐怕也加深了華南或廣東存在有唐代白瓷窯場的推測，而姚潭白瓷碗早由陳萬里氏所指出係北方邢窯作品。〔註九四〕華中、華南是否存在唐代白瓷窯一事，自然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考察來解決，日本出土的唐代白瓷也很可能來自複數的窯場，不過就目前已知的資料看來，可以確定有不少是來自北方邢窯系瓷窯所產。至於其輸日途徑，將於次章討論中日陶瓷貿易互動關係時，結合輸出港口一併考察。

與北方邢窯系白瓷、浙江越窯系青瓷同被視為是晚唐中國對外貿易瓷重要項目之一的湖南長沙窯作品，於日本至少有四十餘處遺跡曾經出土。主要分布於福岡和京都地區，石川縣、奈良縣、佐賀縣、鹿兒島縣和沖繩縣亦有少量發現，明顯集中出土於當時日本政治中心京畿和對外貿易港同時也是大宰府所在地的福岡縣北部。〔註九五〕就出土的長沙窯種類而言，經常可以見到飾模印貼花並於其上施褐彩的黃釉注壺（圖一五），除了京都右京二條三坊一町九世紀中期至十世紀推測為御廚所司代遺跡，與越窯青瓷、北方系白瓷伴隨出土的十件長沙窯碗之外，〔註九六〕其餘所出長沙窯碗類數量均較少。值得注意的是，長沙窯的出土遺跡遠少於越窯青瓷和推測屬北方窯系的白瓷。

儘管近年日方學者曾依據中國方面長沙窯的編年資料，推測石川縣淨水寺跡、福岡縣鴻臚館跡出土的黃釉注壺的時代，有可能在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中期；並從遺跡層位所屬時代推測福岡市柏原M遺跡（SD02最下層）或奈良縣藥師寺西僧房（SD080上層）出土的長沙窯亦應相當於這一時期。〔註九七〕不過依據長沙窯的紀年資料，湖北武昌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年）墓〔註九八〕和湖南長沙大和六年（八三二年）墓〔註九九〕雖出土了飾團扇形褐斑的長沙窯作品，然而以褐綠彩繪飾動物等寫生圖案的作品似以安徽巢湖會昌二年（八四二年）墓的時代最早，〔註一〇〇〕至於裝飾褐綠連珠形點彩作品則見於江蘇

揚州解少卿及其妻蔡氏墓（分別卒於大和九年（八三五年）和大中四年（八五〇年））。【註一〇一】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內壁褐書「開成三年」（八三八年）等字樣的長沙窯黃釉碗，【註一〇二】亦可做為長沙窯彩繪文字流行時期的參考資料。換言之，長沙窯的釉彩裝飾是由單一褐斑加飾，而後才出現以褐彩書字或描繪具象圖形，以及應用褐綠二彩點飾連珠幾何圖案或繪飾各種寫生圖象。因此，藥師寺西僧房或柏原M遺跡包含層出土的加飾褐斑注壺的時代雖可能早自九世紀初，但目前還缺乏可上溯八世紀後半的紀年資料。相對的，京都市右京二條三坊十五町出土的飾綠褐彩注壺【註一〇三】或福岡市多多良込田遺跡出土的褐綠彩繪盤【註一〇四】等作品則可確定屬九世紀前半時期遺物。

前述福岡市多多良込田和柏原M兩處出土有長沙窯的遺跡同時也出土了多彩鉛釉作品，【註一〇五】長沙窯與三彩器見於同一遺跡的還有福岡市十郎川遺跡【註一〇六】和京都市原平安京右京二條三坊遺跡。【註一〇七】福岡市柏原M遺跡出土的三彩印花盤（圖一六），簡報中雖一度誤認為是盛唐三彩，【註一〇八】但於正式報告中已更正為晚唐三彩，【註一〇九】類似的三彩印花盤亦見於著名的九世紀伊拉克薩馬拉（Samarra）遺址。【註一一〇】其次，福岡市十郎川遺跡出土的白釉綠彩標本和同市東區多多良込田遺跡出土的三彩器體殘片及把手，因其施釉作風與柏原M遺跡三彩印花盤極為類似，可推測屬晚唐時期作品。至於平安京右京二條三坊出土的三彩壺殘標本，已由日方學者如矢部良明【註一一一】、龜井明德等【註一二二】所指出其應係晚唐至五代時期作品。此外，大宰府鴻臚館遺跡也出土了施單鉛綠釉的印花盤或帶繫罐等殘標本，從伴隨出土的日產土師器或越窯青瓷、白瓷以及綠釉陶本身的作風可判斷其時代約於九世紀，但個別作品如SK03地點所見綠釉陶蓋的相對年代約於九世紀末至十世紀初。【註一二三】過去雖有學者主張與柏原M遺跡類似的薩馬拉（Samarra）遺址出土的三彩印花殘片有可能是長沙窯或江南某地窯場所生產。【註一二四】從標本所呈現的作風而言我也同意上述的推測，而以長沙窯的可能性最大，然而長沙窯窯址未見鉛釉標本，其確實產地至今不明。

日本遺跡出土的晚唐五代三彩或單色低溫釉陶，除曾與青瓷、白瓷或長沙窯共伴出土，平安京右京二條三坊的三彩壺和二彩碗，更是和施單黃釉的絞胎枕共存於平安時期遺物包含層中，【註一二五】類似的共伴組合亦見於著名的奈良大安寺講堂遺跡（圖一七），後者所出大量的盛唐三彩枕標本是與黃釉絞胎枕共伴出土。【註一二六】截至目前，除了平安京左京七條三坊【註

一一七】和左京八坊二條十町【註一二八】出土有絞胎罐殘標本之外，日本出土絞胎枕的遺址還有平安京右京二條三坊、左京八條三坊以及福岡縣筑紫郡大宰府町大字通古賀字市之上等遺跡。報告者依據出土層位和伴隨遺物認為平安京兩處遺跡所出黃釉絞胎枕的年代約於盛唐至晚唐五代之間。【註一二九】而大宰府市之上遺跡水井出土的絞胎枕，亦可從伴隨遺物推測其年代不能早於八世紀後半，但不會遲至十世紀前半。【註一二〇】從後者市之上遺跡的絞胎枕復原圖看來，其造型呈上面內弧的倒梯形，而枕的高度則略高於大安寺同類作品。我過去曾以陝西唐咸通十五年（八七四年）法門寺地宮出土水精枕的造型為線索，經由與盛唐三彩以及中唐時期耀州窯三彩或九世紀長沙窯同式枕之比較，得出結論認為唐代磚形陶瓷枕有隨著時代的推移，枕的高度有加高的趨勢。【註一二一】這一看法不僅可與出土有陶枕的日本遺跡所屬相對年代互為印證，並可初步判斷平安京和大宰府出土絞胎枕的年代約相當於九世紀，進而可據此糾正過去將類似造型的絞胎枕定年於八世紀的看法。【註一二二】

四、唐至北宋初期輸日貿易瓷及日方的對應態度

就日本遺跡出土可大致確認產地的唐至北宋初期陶瓷而言，至少包括了浙江窯系青瓷、北方窯系白瓷、湖南長沙窯青瓷或白釉綠彩瓷，以及低溫鉛釉器和絞胎陶等。其中，經證實的日本出土五代至北宋前期作品則以浙江地區青瓷佔絕大多數；而低溫鉛釉陶則包括了盛唐北方窯系作品和被推測可能是南方燒製但產地尚待證實的晚唐三彩器。

截至目前，已證實燒造三彩鉛釉陶的唐代窯址計有：河南鞏縣窯【註一二三】、河北邢窯【註一二四】、陝西耀州窯【註一二五】和河南滎陽茱萸等窯址。【註一二六】雖然中國許多省分或地區都出土了唐三彩，其中又以西安、洛陽唐代兩京地區的數量最為龐大，後者所見大量的所謂天王俑或鎮墓獸等三彩俑，於上述窯址並未發現，不難推測應還存在不少尚未被發現的三彩窯址，也有研究者主張江蘇省或山西省出土的三彩器有部分可能為當地所產。【註一二七】但無論如何，窯址調查資料表明，河南鞏縣窯不僅在生產規模，其製作的水準或市場的佔有率等各方面都在當時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鞏縣窯的三彩器以器皿類為主要的生產項目，但亦兼製作部分小型玩具俑類，【註一二八】從窯址標本比較墓葬等遺跡出土作品，可以認為各省所出三彩器皿類有不少即來自鞏縣窯所產。

日本出土的唐三彩，除了奈良市橿原市醍醐町藤原京遺址出土了推測可能是玩具類的小型人俑殘件之外（圖一八），〔註一二九〕其餘均只見器皿類，並以三彩枕所佔比率最大。奈良大安寺講堂前燒土層〔註一三〇〕、福岡縣觀世音寺字藏司整地層〔註一三一〕、福岡縣大宰府鴻臚館〔註一三二〕、佐久市小田井前田遺跡〔註一三三〕、平安京左京四條四坊〔註一三四〕、平安京左京九條三坊包含層〔註一三五〕、靜岡縣城山遺跡〔註一三六〕以及千葉縣向台遺跡等八處遺址均出土了三彩枕。〔註一三七〕其中又以奈良大安寺出土的數量最大已如前所述。該遺跡不僅出土了三彩枕並且伴隨有於絞胎上施低溫鉛釉的絞胎枕，〔註一三八〕而河南鞏縣窯亦同時兼燒上述兩類作品。其次，福岡縣大宰府〔註一三九〕、櫻井市安倍寺跡迴廊基壇〔註一四〇〕和福岡觀世音寺跡溝內（SD1300）分別出土了三足釶的獸足和頸身部位殘片，〔註一四一〕類似器形的三彩作品雖亦見於河北邢窯，〔註一四二〕但鞏縣窯亦有燒製。儘管目前還缺乏足夠的資料可證實日本出土的唐三彩均屬河南鞏縣窯產品，不過若從日本出土三彩器的胎釉器形種類或裝飾作風等推測，一般都相信其極有可能是來自包括鞏縣窯在內的北方窯系作品。但問題是，中國出土的唐三彩種類極多，包括各式俑類和器皿類，鞏縣窯等北方三彩窯生產的作品種類亦屬豐富，為何日本遺跡出土的唐三彩器類卻如此地單調呢？就常理而言，做為輸入國的日本所出作品種類要少於原產地的中國，也是極為自然的事，然而日本出土有唐三彩遺跡至今雖已近二十處，卻經常可見複數遺跡出土了同一器形的作品，特別是出土三彩枕的遺跡高達八處，並且只出陶枕不見其他三彩器，這到底隱含著什麼玄機呢？

日方學者大多主張日本出土的唐三彩與遣唐使有關。岡崎氏進一步依據負責營建大安寺的道慈律師曾從遣唐使入唐，進而將道慈入唐的時間結合遣唐使航路及揚州亦曾出土唐三彩一事，推測日本遺跡的唐三彩有可能是遣唐使節得自揚州而後攜回日本的。〔註一四三〕如前所述，三重縣繩生廢寺出土的三彩印花碗的年代可早自七世紀末，很難說日本出土的唐三彩一定要和養老二年（七一八年）由唐歸國的道慈有關，岡崎氏也未提示具體的例證來證明其推測。儘管如此，做為當時中日往來航路中具有代表性的遣唐使行程，無疑可為探討中國貿易瓷的輸入途徑提供重要線索。歷來對於遣唐使的分期雖有不同的看法，但大體而言，初期遣唐使採行經朝鮮半島沿岸的「北路」（新羅道），後則採經五島列島直接航向長江口的「南路」（大洋路），後者南路又包括了所謂的「南島路」，是由博多南下九州西岸，再沿奄美、沖繩列島於適當位置航向長

江。自日本天智八年（六六九年）第六次遣唐使爲止均採北路，此後至天平勝寶四年（七五二年）第十次遣唐使則航行南島路。【註一四四】如大寶二年（七〇二年）使節團之南島路路線即由九州西岸南下，經薩南諸島、南西諸島後橫斷東中國海入長江口的揚州和明州。【註一四五】肇因於日本和新羅關係惡化而考察出的南島路，由於終究需橫斷東中國海，爲了要縮短橫斷距離和所費時日，故自寶龜八年（七七七年）起的遣唐使又多採南路，即先於五島列島的值嘉島（福江島）等停泊等候季風，隨後直線橫斷東中國海到達長江口的楚州、揚州或明州，回航時亦取同樣路線，由長江口直航值嘉島，其中寶龜八年（七七七年）第十二次和承和五年（八三八年）第十五次遣唐使則係於揚州上岸。【註一四六】此外，圓仁《入唐求法行紀》開成四年（八一九年）正月八日條，也記載了新羅人王請和唐人張覺濟爲交易貨品，由揚州出港而後漂流至出羽國。【註一四七】

衆所周知，被當時人譽爲「揚一益二」富庶甲天下的揚州，既是大江南北水陸運輸的樞紐，也是國際交通的重要港口。從天寶十二年（七五三年）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赴揚州敦請鑒真乘船東渡，攜帶佛像、佛經和右軍真跡等由蘇州黃泗浦出發赴日，【註一四八】或日承和五年（八三八年）大使常嗣從從、留學生欲赴揚州購買香料記載看來，【註一四九】揚州亦是中外物資集散和交易據點。

事實上，如果將日本出土唐三彩與揚州遺跡出土作品進行比較，即可明顯看出揚州在輸日貿易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前所述日本計有八處遺跡出土了三彩枕，而該類三彩枕於中國全國範圍內，除曾見於陝西西安韓森寨【註一五〇】和河南孟津縣朝陽公社【註一五一】或洛陽安樂窩東崗墓等少數遺跡之外【註一五二】，目前只見於揚州地區。不僅如此，揚州唐城手工業作坊遺址等地遺跡還出土了絞胎枕，【註一五三】而該類珍奇的作品於日本遺跡亦可見到。其次，日本複數遺跡出土的三足鎚，於中國的出土分布雖較廣，然於南方地區目前只見於江蘇省並集中出土於揚州地區。【註一五四】至於與日本沖之島出土的貼花長頸瓶類似的作品於中國雖極少發現，卻也見於江蘇常州市，【註一五五】以及鄰近常州的武進縣。【註一五六】而常州則如《元和郡縣志》所載，是揚州到江南驛路的必經之地。這樣看來，做爲唐代北方著名產品之一的唐三彩，其於南方的出土分布明顯集中於揚州，後者出土作品的器形種類既與日本遺跡所見大體相符，並且包括了如陶枕等一般不易

得見的器形，若結合前述揚州在當時中日交往中所佔地位，可肯定日本出土唐三彩應是得自揚州後攜回日本的。唯有在釐清這一事實的基礎之上，我們才有資格進一步討論日唐陶瓷貿易中雙方的對應態勢及日本是否存在品味的問題。也就是說，日本遺跡出土中國陶瓷的種類偏向，實與日方獲得中國物資之主要途徑的中方對日貿易港的集散作品種類息息相關。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河南鞏縣窯生產的三彩器要比他窯燒造的同類作品，佔有更廣大的消費市場。揚州地區如楊廟唐墓的豆形器〔註一五七〕、市郊外的鉢〔註一五八〕、大東門街的鉢盂〔註一五九〕或揚州某地出土的釉陶絞胎枕等，〔註一六〇〕均可從作品造型或施釉特徵大致判明其可能為鞏縣窯作品〔註一六一〕。特別是雙橋公社唐墓的三足鎏或汶河西路出土呈人面造型較為特殊的三彩器，〔註一六二〕更與窯址標本完全一致。〔註一六三〕另一方面，經報導的揚州出土的鞏縣窯，除了三彩之外，還有同屬鉛釉系統的綠釉陶〔註一六四〕、白瓷〔註一六五〕以及唐代青花瓷等。後者所謂唐青花是否確為釉下彩，目前學界仍有不同的看法，〔註一六六〕然與本文論旨有關的是，揚州市區文昌閣附近三元路等地出土的唐青花曾經取樣進行胎釉成分分析，證明其有可能是河南鞏縣窯一帶的產品。〔註一六七〕做為南北交通重要據點的揚州既是江淮地區米、鹽、茶和其他物資的集散地，同時也利用運河將東南的米粟物資運往關中和北方各地，〔註一六八〕不僅船員經常攜帶當地土產往返南北進行貿易，瓷商客也可能經由大運河將北方瓷器運往揚州而後泛海他國。此外，從揚州中晚唐時期《丁夫人墓志》「自元東來，播流淮左」，或《孫纖墓志》「雖貿易往來而與物無賁」等記載亦可窺知，揚州也居住了因安史之亂而南遷的北人，其中有的又以經商營生，〔註一六九〕因此揚州出土有大量北方陶瓷可說是極為自然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揚州不僅出土了唐代鞏縣窯白瓷，另出土了不少河北邢窯等北方白瓷作品，〔註一七〇〕特別是三元路郵電大樓工地所見白瓷碗施釉有精粗之分，底足造型有壁形和圈足之別，部分作品施化妝土。〔註一七一〕上述特徵正與日本遺跡出土的唐代白瓷一致。雖然筆者還無緣對兩地所出作品進行全面的實物精細比對，不過揚州三元路、史可法西路教育學院或市文化宮，以及已經確認的日本平安京西寺跡等遺跡既出土了北方邢窯系白瓷，結合前述揚州在唐代中日交往中所佔據的地位或揚州出土北方釉陶與日本遺跡發掘品的類似性，可以認為日本出土的唐代白瓷有不少應是由揚州出港的。日方學者因顧及北方陶瓷運輸不便，並主觀地想像日本遺跡極少發現北方陶瓷，從而推測多數具有北方窯系特徵作品可能為

江南某地所生產。然而如果將當時赴日之重要港口揚州及匯集於該地的南北物資納入考察範圍，此一疑難或可迎刃而解。事實上，日本平安朝文獻《經國集》即收錄有「首描寫當時飲茶情景的（和出雲太守茶歌）。其中有「獸炭須臾炎氣盛，盆浮沸浪花，起鞏縣垞商家盤，吳鹽和味味更美」句，所謂「鞏縣垞」可能即河南鞏縣生產的陶瓷器，而鞏縣窯白瓷碗於揚州亦曾出土。故該一見於茶道史論著而未能引起陶瓷史界關心的重要記載，也間接地透露日本出土唐代白瓷可能包括部分鞏縣窯製品。〔註一七二〕另一方面，歷年來於揚州三元路北側、揚州城北、汶河路或揚州南通西路等地先後採集到二、三百件的伊斯蘭翡翠藍釉陶器標本，〔註一七三〕並且是常與推測可能是鞏縣窯的所謂唐青花瓷等共存於同一遺址。有趣的是，做為當時日本對中交往門戶的九州大宰府、鴻臚館或兵庫縣福田等遺跡也出土了同類的伊斯蘭陶器。〔註一七四〕過去曾有人推測日本遺跡所見伊斯蘭陶器，若非是由中日方人士攜回日本，則有可能是渤海人得自揚州。〔註一七五〕雖然我們已難得知中國、日本出土的波斯陶器是否為獨立的商品或是裝盛某種物資的外容器，抑或兩者兼有之？不過從揚州出土陶瓷情況及其貿易瓷性質看來，遺留在日本遺跡的伊斯蘭陶器極有可能是由波斯人等外國商賈一度攜入揚州後轉販日本的。此外，如前所述日本福岡久留米市西谷火葬墓出土的婺州窯青瓷壺，〔註一七六〕於揚州亦有少量出土，〔註一七七〕雖然日本所見浙江窯系作品多由明州（寧波）等同省港口出港，但並不排除有得自揚州的可能性。這樣看來，揚州既是匯聚了各地物資的重要轉口站，也是日本獲得取各方商品的據點之一。

揚州出土的唐代外銷瓷以湖南長沙窯作品數量最多，出土頻率也最高。衆所周知，長沙窯不僅是唐代外銷瓷中極為常見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燒製因應西亞諸國品味嗜好之圖樣紋飾作品的具有特色的瓷窯，其於國外的出土分布雖包括了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各國或地區，但以西亞九至十世紀對中國的著名貿易港，波斯灣北岸的西拉夫（Sīrat）港市遺跡出土數量最多。〔註一七八〕《舊唐書·田神功傳》載中唐時期「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產，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既反映了胡商在揚州的熱絡貿易活動，實不難想像胡商在長沙窯外銷事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干預了長沙窯的生產，以至於會出現以釉下彩繪外國捲髮女子的作品〔註一七九〕或揚州東風磚瓦廠唐墓出土的於器身以阿拉伯文書寫「真主真偉大」字句的青釉綠彩四繫壺。〔註一八〇〕問題是，揚州既是日本獲得包

括外銷陶瓷在內的中國貨物的據點之一，揚州地區出土的唐代外銷瓷不僅是以長沙窯為數最多，近年於揚州舊城區汶汭路一處十六米範圍內的堆積發現了可復原成完整器的長沙瓷五百件，也是值得留意的現象。由於該處堆積不見他窯作品，僅長沙窯蓋盒一種即達百件之多，結合發現地點鄰近古河道，報告者推測是因當時卸貨清倉時殘器傾倒累積而成，並認為可據此說明揚州存在有專營瓷器的店鋪。【註一八一】從文宗《大和八年疾愈德音》「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史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往來通流，自存交易，不得重加率稅」的記載，【註一八二】或揚州文化宮發現推測是胡商邸店，旅舍性質的建築遺址等看來，【註一八三】揚州確是為外國商旅提供了某種便捷的設備和保護措施。當然也不排除存在經營外銷瓷器的店鋪，而長沙窯則可能是其販售的主要商品之一。

然而，截至目前日本出土有長沙窯的遺跡僅四十多處，比起日本所出含部分北宋時期作品在內的越窯近四百處，白瓷一百餘處顯然偏少。依據九十年代初期的統計，四十餘處長沙窯遺跡所見該窯作品出土總數量僅一百三十餘件（片），相對的，越窯則高達四千五百餘件（片）。【註一八四】這到底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呢？會不會是肇因於當今多數學者所一致認為並不存在的，日本之品味與選擇呢？眾所周知，長沙窯作品中常見的釉下彩鳥紋或葡萄、對鳥等模印貼花紋飾，有可能是因應西亞地區人們的嗜好而設計的。揚州東風磚瓦廠【註一八五】、泰國猜耶林文波（Laem Pho）【註一八六】出土的帶阿拉伯文長沙窯作品更是該一現象的突出例子。此外，波斯灣西拉夫（Sira）遺址與長沙窯伴隨出土的還有推測屬廣東地區燒造的於釉下陰刻阿拉伯人名的青釉四繫罐殘標本，後者亦被認為是阿拉伯人的定製品【註一八七】。以上種種均可與長期以來學者們依據長沙窯的出土分布或作品本身的造型裝飾特徵，所得出之長沙窯是主要用來輸出的外銷瓷之結論相互印證，幾乎已成定論。雖然如此，已故的三上次男氏曾經指出，西亞諸國出土的長沙窯以碗盤類居多，而東亞的日本和朝鮮半島則以壺罐類最為常見，東南亞則居兩者之間，而東北非埃及福斯塔特城（Fustat）雖出土了不少南方越窯或北方白瓷等唐代作品，卻未見任何長沙窯作品，因此各國對於中國陶瓷的種類是有所選擇的。【註一八八】做為日本獲取中國物資重要據點之一的揚州遺存的外銷瓷以長沙窯的數量最多，但於日本卻較少出土，這不正是日方對於中國陶瓷的選擇及其品味的反映嗎？其實，比長沙窯時代要早的奈良三彩器上已經透露出與此有關的訊息。所謂奈良三彩乃是在唐三彩的影響之下，

於奈良時代八世紀前半完成的日本國產多彩鉛釉陶，這裡的重點是奈良三彩雖模倣唐三彩外觀上的繽紛施釉作風，但在造型方面則借用了當時流行的響銅等金屬器〔註一八九〕，也因此造成了唐三彩與奈良三彩截然不同的造型特徵。日方之於中國陶瓷模倣的對應態度，很能夠說明日本的選擇與品味傾向，並且至遲在八世紀的作品中已有所反映。長沙窯應用釉下彩的技法書寫詩句或廣告語等文字以為裝飾，早已普遍為人所熟知，然而相對於前述書寫或陰刻有阿拉伯文字的作品目前只見於東南亞、西亞或貿易港揚州，以漢字書寫的作品於國外似只見於屬於漢字文化圈的朝鮮半島出土的「鄭家小口天下有名」字銘注壺。〔註一九〇〕這固然有可能是長沙窯的生產者為因應拓展不同市場所採取的必要措施，但各不同消費市場對於作品的好尚與選擇或許才是促使長沙窯該一意識抬頭的根本原因。當今的日方學者，大多主張日本對於輸日的晚唐陶瓷只能全盤接受沒有選擇的餘地；並且既承認日本較少出土長沙窯是因其西亞裝飾的作風未能獲得當時人們的認同，同時又矛盾地主張日方不存在選擇權。〔註一九一〕日本學者之所以堅持此說，或許是與他們對於中國外銷瓷或輸日貿易瓷的歷史分期觀點有關，然而如上所述，我們從當時日方獲取中國物資重要據點之一的揚州考古發掘資料，以及長沙窯的裝飾作風和出土情況，可以肯定各國出土唐代陶瓷的種類偏向除與港口等取得途徑有關之外，消費地人們的好尚同時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而日本亦出土波斯陶器一事，則又透露了日本消費市場對於中國陶瓷的選擇，除了狹義的品味因素之外，可能還與各不同陶瓷的價錢有關。但這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

從現存的文獻記載可知，自日本弘仁十年（八一九年）唐人張覺濟偕同新羅人為販售貨物從揚州出發漂流至出羽國，或被視為唐商客首次赴日的承和九年（八四二年）由明州（寧波）解纜的李鄰德商船，已有多次唐商客往來中日兩國之正式記錄，並且在寬平六年（八九四年）菅原道真奏請廢遣唐使後仍持續地進行貿易活動。〔註一九二〕其中可確知出港地的計十例，但若考慮同一人物在不同年次赴日時可能亦選擇與前回相同港口出航，則應以十二例計算，而由明州出港的佔了七次之多，其次有二例由台州出發，楚州、蘇州和廣州僅各一例。五代時雖乏明確的出港地記錄，但可從「吳越商人蔣承勳」等商客籍貫間接推測或由浙江出港，至於北宋時期四十六回的赴日記錄中，可確知其出港地的七例中，明州佔了五回，台州、建州各一回。〔註一九三〕晚唐至北宋正是浙江青瓷蓬勃發展並大量外銷的時期，而以越窯為主要的作品多經由明州出

港。這不僅可從文獻記載結合日本出土的大量遺物中輕易窺見得知，也可於寧波地區的考古發掘得到必要的印證。特別是七十年代寧波余姚江出海口附近發現的伴隨有「乾寧五年」（八九八年）銘方磚的唐代沈船，和寧波東門口明州碼頭遺址的調查，更是明示了越窯青瓷與輸出港之關係，以及日方獲取越窯青瓷等的途徑。前者沈船中和船體附近發現了數百件越窯青瓷和長沙窯青釉褐彩器及少量黑釉瓷。〔註一九四〕後者明州碼頭遺址可分五文化層位，第四層出土了越窯上林湖和郭家峙窯五代至北宋青瓷，最下第五層則出土了上林湖越窯另若干金華地區婺州窯青瓷作品，由於該層所見作品均與寧波和義路唐大中二年（八四八年）層作品相同，故其年代也應相當於這一時期。〔註一九五〕

事實上，有關日本出土越窯系青瓷的輸出港口或路線，歷來已有許多學者結合文獻記載進行考察，結論一致認為明州是越窯輸日的主要港口。〔註一九六〕本文同意該一看法，因此無必要在此重複贅述。引起筆者興趣的是，前述余姚江口發現的推測原應前往日本的沈船中所見長沙窯，既透露出部分長沙窯亦曾由明州輸日，寧波東門碼頭遺址出土的婺州窯也顯示了金華地區的瓷窯作品有一部分是先集結於當時著名貿易港明州而後放洋出海的。這一情形與揚州匯集有許多南北物資在性質上有類似之處，不同的是明州極少見到北方瓷窯作品。如前所述，揚州亦曾出土少量婺州窯青瓷，故雖不排除日本遺跡同類作品有由揚州輸日的可能性，但若考慮到明州出土例和產地與輸出港的交通便捷條件，明州和多次見諸於文獻記載的台州或許才是日本獲取婺州窯的主要來源地；而於日正曆元年（九九〇年）由台州赴日的宋商客中不僅有台州人還有婺州人。〔註一九七〕至於前述日本出土有台州地區瓷窯作品一事若屬實，則估計有較大可能是由當地出港的。

這樣看來，日本遺跡出土的唐至北宋初期陶瓷的種類傾向，既與日本取得中國物資的來源，即匯集於輸日貿易港的作品種類息息相關，在此一大前提之下，日方的品味高尚及消費能力亦能產生積極的作用。其中既包括聚集在輸日港口之各地瓷窯種類的挑選，或許也曾針對同一瓷窯不同檔次作品進行選擇。日本出土五代北宋初越窯青瓷相對少見刻花、鏤空的精質產品，除了是因中國商客對於日本消費市場的主觀判斷所造成之外，日方的品味和消費習慣亦不容忽視。與此相對的，越南、泰國等中國赴中近東貿易航路上之東南亞國家常見的晚唐時期廣東生產的外銷青瓷器，〔註一九八〕於日本幾乎未見出土。這一事實正與廣州商船極少赴日一事吻合，並且再次說明了當時外貿港物資與國外消費地輸入產品之間的緊密關連。

五、日本出土宋代陶瓷諸問題——以選擇購買和使用方式爲中心

約相當於日本平安中期至鎌倉時期的宋代（九六〇—一二七九年）近三百年間，中國輸日貿易瓷無論在種類或數量上都比輸日唐代陶瓷增多，於日本的出土分布既擴大到東日本沿海或內陸許多遺跡，使用階層亦普及各地武士層，特別是在南宋時期達到宋瓷輸日的最高峰，而鎌倉幕府——北條氏更開啟了由博多至瀨戶內的海上交通，促使鎌倉地區得以輕易獲得中國陶瓷。〔註一九九〕北宋前期日本出土的以越窯爲主的浙江青瓷窯系作品已如前所述，於此不再重複贅述。然而，在正式進入討論日本出土宋瓷問題之前，我們卻不得不面臨近年來由矢部良明等所提出的有關日本出土中國陶瓷的歷史分期觀點。〔註二〇〇〕按照矢部氏的理解，日本除了基於末法思想而營建的藏納經卷的經塚之外，極少出土屬於十一世紀後半至十二世紀的中國陶瓷，也就是說介於同氏第一期（九世紀至十世紀）和第二期（十二世紀至十四世紀）之間的十一世紀後半至十二世紀初北宋時期，幾乎可說是中國陶瓷輸日歷史中的一個空白階段。

就中國的外貿局勢而言，北宋開寶四年（九七一年）於廣州、咸平二年（九九九年）於杭州和明州，並在元祐二年（一〇八七年）及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年）於泉州和密州板橋鎮設置了專職對外貿易事宜的市舶司，各港口的市舶機構在北宋中期以後雖有興廢，但其趨勢則是興起發展；反映了海外貿易的熱絡景象。〔註二〇一〕同時，文獻上也多次記錄了北宋商客赴日從事貿易活動。因此，本文有義務先針對日本遺跡所見上述令人費解的現象，做些粗略但卻是必要的觀察。日本出土的北宋陶瓷，除了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前半的浙江窯系青瓷之外，我以爲，一般被定年於南宋至元代的廣島縣福山市草戶千軒等遺跡（圖一九），〔註二〇二〕或博多遺跡群〔註二〇三〕等出土的青瓷篋劃花紋作品是極爲重要的參考資料。以劃花、篋點做爲主要裝飾的青瓷碗碟類常見於日本各地遺跡發掘品，也曾見於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一五四四—一五九〇年）之《山上宗二記》。後者記載了著名茶人村田珠光（一四二二—一五〇二年）以這類碗做爲茶道具，後人並將之命名爲「珠光茶碗」，〔註二〇四〕故過去日方學者習慣上經常以珠光青瓷來概括具有類似裝飾風格的青瓷作品。〔註二〇五〕自

五十年代福建省同安縣發現燒造該類作品的窯址以來〔註二〇六〕，已證實有多處燒製類似產品的窯場，並以福建省的分布最為密集，產量也最大。為便於歸納討論，許多學者就以同安窯系來泛稱這類以劃花篋點紋為主要裝飾的青瓷作品。〔註二〇七〕由於窯址調查資料表明，福建境內所謂同安窯系青瓷的燒造時代約於南宋至元代，因此包括矢部氏在內的多數學者遂將日本遺跡出土的這類青瓷作品的時代定於南宋或南宋至元代。另一方面，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有學者指出，浙江境內的龍泉、金華、永康、義烏、江山、武義等各窯場也曾燒製篋劃花紋青瓷，其中以龍泉窯的時代最早，其不僅直接影響到江山、武義等窯，也帶給福建同安窯相當的影響。〔註二〇八〕近年來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進行的山頭窯與大白岸龍泉東區窯場的發掘調查資料，更可為上述論點提供堅實的基礎。〔註二〇九〕有關龍泉窯東區窯場出土青瓷的編年雖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則是贊同由龜井明德氏所做的編年分期，即龍東第一階段作品的相對年代約於十一世紀七十年代至十二世紀二十年代；第二階段雖包括十二世紀二十年代作品在內，但以同世紀七十年代為下限。〔註二一〇〕如果依據龜井氏的編年和窯址調查報告書所載作品，進而對照前引草戶千軒或博多遺跡群等諸多遺跡所見篋劃花紋青瓷，可以確認日本遺跡出土的所謂同安窯系或珠光青瓷當中，有不少是浙江龍泉東區窯場所燒造，而其中即包括了該窯十一世紀後半和十二世紀前半的早期作品在內。因此，日本遺跡極少見到北宋陶瓷的看法，其實只是相對於數量龐大的南宋陶瓷的模糊印象，而該一印象也隨著中國方面窯址出土資料和遺物的精細編年而有修正的必要。如此也才可以理解《參天台山五台山記》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年）十月十五日條所載入宋僧成尋謁見神宗時，提到日本國最需要的貨物中包括了「茶坑」〔註二一一〕。所謂的「茶坑」是日本當時對中國陶瓷的泛稱。〔註二一二〕

綜觀日本出土宋代陶瓷的大致產地和種類，除了前述浙江青瓷窯系作品外，至少還包括福建窯系、同安窯系（圖二〇）、泉州窯系（圖二一一）、浦城大口窯、南平市茶洋窯；江西景德鎮窯、吉州窯（圖二一二）、贛州窯；廣東奇石窯、西村窯等所生產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黃釉或白釉褐彩等造型和裝飾均極為豐富的作品。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窯址尚待證實，但估計應屬東南沿海地區燒造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黑褐釉瓷以及三彩低溫釉陶等作品（圖二三）。雖然少數遺跡如平安京左京三條三坊七町出土有陝西耀州窯青磁碗，〔註二一三〕福井市一乘谷朝倉氏遺跡第十三次和第四十次調查時也出

土了河北定窯鉢；〔註二二四〕第一二七次調查鳥羽離宮時也曾發現磁州窯系白釉黑剔花牡丹紋壺殘片；而滋賀縣大津市上仰木遺跡更出土了北宋磁州窯綠釉刻花梅瓶標本（圖二二四）。〔註二二五〕上述諸例當中，一乘谷朝倉氏遺跡的相對年代約在十五至十六世紀，故該遺跡出土的定窯印花紋鉢有可能是一度傳世後才廢棄的。無論如何，日本出土宋代北方窯系之事應屬特殊的個別案例，其在本國出土宋代陶瓷的數千處遺跡之中僅佔九牛一毛，與大量出土的南方瓷窯作品不可同日而語，比起唐代有不少北方陶瓷經由揚州輪往日本的情形大相逕庭。這也反映了中國貿易港的盛衰以及宋代南方貿易瓷窯的興盛情況。

從文獻記錄不難窺知，宋代和日本的交往主要是由明州、台州、杭州、建州和福州等港出發，但也有由溫州或洪州等赴日的個別例子。〔註二二六〕如前述於各港口設置的市舶司之主要任務，是對商舶貨物進行抽解博買和課稅，防止走私，故《朝野群載》所收〈大宰府附異國大宋商客事〉所載著名的泉州商人李充於日本長治二年（一一〇五年）攜帶了瓷碗貳百床、瓷碟壹百床等貨物欲赴日貿易時，亦至明州市舶司取得赴海外貿易的許可證，即所謂的「公憑」或「公驗」。〔註二一七〕從李充的出身地推測其裝載赴日貿易的陶瓷極有可能為泉州或福建地區的產品。其次，就如過去研究者所指出，用來外銷的價廉而量大的陶瓷，其產地和貿易港之間的距離和便捷之運輸條件是重要的因素，故銷往日本的貿易瓷多屬浙江、福建和廣東等沿海地區瓷窯產品。〔註二二八〕這點亦可由日本近數十年來的考古發掘得到證實，筆者並無異議。然而，本文所關心的是，在日本出土的大量宋代南方陶瓷當中，卻存在著部份於中國本土或東南亞等其他地區極為少見，甚至完全未能見到的作品，這就為探討中日陶瓷貿易的雙方態勢提供有益的線索。

日方學者曾將宋元時期輸入日本的白瓷四繫罐（圖二二五）、水注（圖二二六）和梅瓶（圖二二七）戲稱為「三神器」。這不僅是因為與武家文化密切相關的瀬戶燒曾倣製上述三類作品，甚至晚迄桃山時代十七世紀初有權武將之居地和城廓也都有出土，特別是梅瓶和水注直到德川幕府發佈元和偃武（一六一五年）宣言之前一直被珍重地保存傳世，故可視為是武家文化的象徵。〔註二二九〕呈小口、豐肩，肩以下弧度內收的梅瓶是日本遺跡經常可見的器形，特別是以鎌倉地區發現最多，從幾乎凡是鎌倉時代的遺跡都曾出土梅瓶一事不難想像日方對於該類作品的喜愛程度。〔註二三〇〕其中雖有部分作品的時代或

可晚至十四世紀，【註二二一】但多數均屬十三世紀後半時期作品。【註二二二】日本出土的青白瓷梅瓶的產地不一，京都法勝寺出土者被視為景德鎮所產；此外，據說福建德化窯系作品中亦可見到類似的作品。【註二二三】長谷部樂爾氏也曾推測日本遺跡常見的於器身飾劃花渦紋夾雜梳紋的厚胎青白梅瓶可能來自泉州附近窯場，【註二二四】然而均止於推測的階段。從景德鎮近郊宋墓出土的陰刻纏枝花並以梳紋填地的厚胎青白釉梅瓶，既與景德鎮湖田、南市街窯址遺物相同，【註二二五】也和京都市太秦井戶廢寺出土作品有類似之處看來，【註二二六】日本出土的梅瓶應包括一部分景德鎮窯系作品。無論如何，相對於日本所見大量梅瓶，中國本土卻除了若干窯址所見標本及少數墓葬出土品之外，一般極少出土，明示了宋瓷輸日時日方的品味選擇，這點亦可由東南亞或埃及福斯塔特（Fustat）遺址雖出土了大量的宋瓷卻幾乎未見梅瓶一事間接窺測得知。

所謂梅瓶的語源不明，在宋代有可能稱為經瓶，經為修長之意【註二二七】。從宋代磁州窯梅瓶瓶身書有「清沽美酒」或「醉鄉酒海」等字銘，【註二二八】結合河南白沙第一號宋墓墓主夫婦飲宴圖壁畫中置有梅瓶等情形推測，【註二二九】這類小口長瓶應是盛酒器。我雖不排除日本遺跡出土的梅瓶，原本可能亦裝盛酒類外銷，即屬於物資的外容器，但值得留意的是，日本茨城縣茨城町長岡出土的劃花牡丹紋梅瓶則是做為藏骨器來使用。【註二三〇】而做為所謂三神器之另一重要器類的白瓷水注也經常被用來裝盛火葬骨，其中又以和歌山縣高野山奧之院遺跡或鎌倉極樂寺納骨堂的出土例最為人們所熟知。【註三三一】上述日本遺跡出土宋元代陶瓷的用途改變及做為武家文化格式道具的新的象徵意涵，既反映了日方對於輸入陶瓷的種類需求和對應態勢，或許也和日本為何會集中出土某些在中國和其他地區較少見到的器種，即日方的選擇購買有關。此外，推測是東南沿海省分所生產的白瓷四繫罐於中國本土窯址或其他遺跡均未曾出土，但於日本遺跡則經常可見。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其時代可早自十二世紀，持續生產至十三世紀後半至十四世紀前半。如果依據八十年代平出紀男氏所蒐集羅列的六十處日本遺跡出土的該類四繫罐資料，【註三三二】則近半數遺跡屬墓葬和經塚，墓葬出土例且多刻意毀損罐口頸部位以便做為藏骨器來使用，是與當時日本佛教葬儀觀相應的具有宗教性質的器物，這也是日方給予的新的使用方式，並且有可能兼顧該一用途而進行選擇性購買，日方學者所稱的三神器的出土情況和使用方法多少可說明這一事實。

另外，我們也可從十四世紀鎌倉時期愛知縣瀬戶窯曾大量仿燒上述三種器形而輕易得知日方對於這類作品的偏愛。【註二三三】

我認為，最能說明日方變更中國陶瓷的原來使用方式之具體例證可能要屬經塚出土遺物了。經塚的營造是基於所謂的末法思想，即末法之世經典滅絕，為提供釋尊入滅後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做為第二釋尊再生的彌勒菩薩於龍華樹下說法時所需經籍，故未雨綢繆寫經埋藏。末法思想雖源自中國，但營建經塚則是日方的創舉，其濫觴可上溯自九世紀入唐求法的圓仁（慈覺大師）曾埋藏如法經之事。【註二三四】經塚出土的宋代陶瓷數量不少，除了岩手縣和賀郡東和賀町谷內圓內山神社第二經塚利用前述白瓷四繫罐做為經筒外容器之外，【註二三五】福岡縣勝山町松田經塚亦曾以中國南方所產的黑褐釉四繫壺為經筒容器。後者並伴隨出土有大治二年（一二七一年）紀年銘銅經筒，故做為外容器的四繫壺之相對年代也約於十二世紀前半（圖二八）。【註二三六】這類經常被用來裝盛火葬骨或經筒外容器的黑褐釉帶繫壺於中國可能原是裝盛液態或其他民生物質的容器，其與在日本的使用方式有天壤之別。【註二三七】值得一提的是，佐賀鹿島市片山第一經塚出土的宋代褐釉四繫壺於繫耳處飾一周陰刻弦紋，並於弦文下方加飾帷幕狀波形陰文（圖二九）。【註二三八】據日天文十三年（一五五四年）《茶具備討集》所載「遠山肩以篋鏡畫連山之形也」，【註二三九】則這類壺無疑就是以篋在四耳壺肩畫出連山狀的所謂「遠山」壺，並且在室町時期（一三九二—一五七三年）還從經筒外容器等實用性質，一躍成為體現冷枯寂美學觀的鑑賞對象，既是當時貯藏茶葉的貴重容器，也是威權和財富的象徵以及大名的格式道具。【註二四〇】

日本經塚遺跡分布極廣，北自青森縣南達鹿兒島縣幾乎遍及全國各地，但出土有宋瓷的經塚之營建時代均集中於平安後期至鎌倉初期，並以文化中樞地的近畿地方、瀬戶內海沿岸和九州博多附近較為普遍。出土作品當中又以青白瓷小型蓋盒數量最多，其次則為小碟、水滴或經筒等（圖三〇）。依據近年來的窯址發掘，可知經塚出土青白瓷蓋盒的產地，至少包括了福建浦城大口窯【註二四一】和同省以燒造黑釉茶盞聞名於世的建窯，【註二四二】但對於其用途則長久以來都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如長谷部樂爾氏依據朝鮮高麗時期古墳出土同類盒中置有白粉，進而推測其可能是化妝用粉盒，【註二四三】此外也有主張是佛具香盒的看法。【註二四四】雖然日本經塚出土青白瓷盒內多數未置任何物品，但如三重縣伊勢市朝熊第五號經

塚青白盒內則見有二十八顆玻璃珠（圖三一），類似的例子還可見於和歌山縣神倉山第三號經塚之青白瓷小罐中的各色玻璃珠，以及出土地不明的內置玻璃珠、鈴、露玉的經塚出土銀盒。〔註二四五〕從經塚性質看來，盒內置珠的習慣有可能與《法華經·普門品》解珠玉瓔珞供養觀音的記載有關，即受到向佛喜捨珠玉瓔珞之風的影響。〔註二四六〕其次，廣島縣嚴島神社內經塚所出於盒內另設蓮莖托置三只小碟的青白瓷盒，也被認為可能與書寫如法經時所需十種供養中的香料有關。〔註二四七〕如果上述推測無誤，則其與推測原是做為化妝用粉盒的中國本土使用方式大異其趣。此外，從《如法經》所載寫經具有白瓷硯和水滴等看來，經塚出土的文房用具也應與埋經供養時經常伴隨埋藏的習慣有關。如前所述，經塚出土的宋代陶瓷以白瓷或青白瓷最為常見，過去有學者認為其又與詳記如法地中埋納的《門葉記·如法經篇》的「凡寫經之間……白磁大小器，淨布切等細細可意」記載有關，即以白瓷寫經取潔齋之意，據此則白瓷的釉色又被賦予了宗教的意涵。〔註二四八〕經塚出土宋代陶瓷當中，無疑以裝盛經卷埋藏入塚的所謂經筒最具特色。宋瓷經筒以青瓷居多（圖三二），但間可見到施青白釉或白釉作品（圖三三），其呈直筒狀帶蓋的造型特徵無疑是做自日本特有的銅經筒。〔註二四九〕如前所述，營建經塚埋藏經籍是日本獨自發展出的文化現象，故該類於中國前所未見並且只出土於經塚的直腹經筒，應是日方向中國定製的器物。〔註二五〇〕從大宰府四王寺山經塚群中，中國製經筒與「天永元」（一一一〇年）或「元永三年」（一一一八年）銘日本銅經筒共伴出土資料得知，日方至遲在十二世紀前期已經取得向中國定製符合其本國使用方式器形的能力。〔註二五一〕雖然就日本出土的宋瓷看來，這類定製品的數量不多，可確認的造型種類亦極有限，但無疑是中日陶瓷貿易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六、結語

總結以上敘述，可以認為日本於七世紀中後期已萌發對中國陶瓷的興趣，並有少數作品被攜往該地，改變了長久以來陶瓷始終未能進入中日文物交流行列的情況。至八世紀前半時期更有相對多量的陶瓷輸入日本，其中又以日本近二十處遺跡出土的盛唐三彩器最具代表性，這既反映了日本當時的中國陶瓷好尚與日俱增，日本出土唐三彩的分布或遺址性質則又說明了

其使用層是侷限於官衙、寺院等少數有力階層。從中國本土的唐三彩分布情形和各地所出作品的種類特徵，進而結合中日往來港口航路及日本出土例，估計日本遺跡所見唐三彩應是得自揚州，故日本出土唐三彩之種類偏向亦與揚州出土唐三彩器種頗為類似。雖然目前已難檢證日方學者所主張的唐三彩是由遣唐使所帶回的看法，然而無論是從日本出土中國陶瓷自八世紀以來連綿不絕的連續性特質，或唐三彩於日本的出土頻率以及其他國家之出土例，我認為其應屬廣義的貿易瓷，並且是購自揚州。因此，日本學界所一致主張的中國貿易瓷始於九世紀的看法有重新考慮的必要。其次，日本出土的晚唐白瓷除了包括北方邢窯系作品之外，另有不少產地尚待証實者〔註二五二〕。不過無論是從前述平安朝文獻《經國集》的記載，或揚州的考古發掘成果，都可間接推測日本出土的晚唐白瓷中應有部分作品來自河南鞏縣窯。特別是京都市中京區出土的璧形足白瓷碗，口沿呈四花瓣形，花口處至碗內壁各有一直條堆線紋（同圖一三），其造型和裝飾特徵均與鞏縣窯出土標本一致〔註二五三〕，是值得重視的線索。晚唐至北宋時期中國貿易瓷於數量或種類上都比以前有顯著的增長，這一情況也反映在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或地區的考古成果上。如果將這時期日本出土作品與其他國家出土例進行比較，不難觀察得知各地出土中國陶瓷的種類既與各自取得中國物資的主要來源，即匯聚於各不同貿易港的陶瓷種類息息相關，同時各消費市場的品味好尚業已開始發揮積極的作用。儘管在中國強勢的陶瓷輸出中，此一品味選擇似乎顯得微不足道，但卻是中國早期貿易陶瓷史上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據此我們才能較圓滿地解釋日本出土該時期中國輸入陶瓷的種類偏向。

日方的品味選擇隨著時代的推移逐漸趨於明朗，至遲於十二世紀前半甚至出現了向中國定製符合自身需要的陶瓷，中日雙方陶瓷貿易態勢已由八世紀時的全盤接收到九世紀以降的有限的品味選擇，發展到量身定製的階段了。不過定製的種類和其造型項目並不多，總還是以中方經常性赴日港口鄰近窯窯所生產的一般性產品為輸入的大宗，但對於這些窯場作品進行器形選擇的跡象則十分明顯。其中有的仍沿襲其於中國的使用方式，但為順應日方的生活習俗而被大量地進口，如做為喫茶道具的黑釉茶盞於日本大量出土（圖三四）即是肇因於日本飲茶風尚的普及和應運而生的對茶碗的需求，其中除包括若干沿原鑲裝金屬釦的優質建盞之外〔註二五四〕，另有不少被比定為《君台觀左右帳記》等室町時期文獻記載的所謂灰被茶碗〔註二五五〕，後者多採用二次掛釉其造型與十四世紀日本瀬戶做製的黑釉碗關係密切〔註二五六〕，可惜其確實的產地和編

年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雖然福建南平市茶洋窯曾出土類似作風的黑釉盞，【註二五七】不過其是否亦屬二次掛釉？仍有待查証。反觀東南亞或中近東地區雖出土不少宋瓷，但具備嚴格定義茶碗造型的黑釉作品所佔比例卻極小，且品質一般遠遜於日本出土者。有趣的是東南亞國家則出現許多宋代中國南方燒造的宗教徒盛水淨手用的所謂軍持（Kendi），【註二五八】而日本則幾乎不見該類作品，反映了消費地的愛好已在以燒製外銷瓷為業的窯場中產生作用。另一方面，輸日的宋瓷有的被日方改變了其在中國原有的使用方式，甚至被賦予了於中國本土未曾存在的象徵意義，這點可由輸日的黑褐釉帶繫壺輕易窺測得知。其次，我們又可以黑褐釉帶繫壺為例，結合日本的文獻記載得知其於日本社會的評價或使用方式是隨著時代而有所不同，而十六世紀興起於堺地方的侏茶美學觀則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註二五九】在該美學觀的影響之下，前述褐釉帶繫壺或南宋福建地區生產的篋劃花紋粗製青瓷之價值已凌駕福建建窯所燒製的優質黑釉茶盞之上，【註二六〇】這是在考察日方接受中國陶瓷態勢時應予留意之處。

可判明出港地點的北宋商客赴日港口以浙江明州最為頻繁，此既可與日本大量出土由明州等地輸出的越窯系青瓷相互驗證，寧波市天一閣所藏旅居日本國大宰府博多津的華僑捨錢修路奉獻功德的南宋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年）刻石，也說明了明州和九州大宰府的密切貿易往來。【註二六一】另外，從博多、大宰府史跡等地出土的外底足墨書「丁綱」、「張綱」等宋代瓷碗，結合宋人朱彥《萍州可談》：「以臣商為綱首、副綱首、雜事，市舶司給朱記」的記載【註二六二】可以推測主要由市舶司管理的綱首【註二六三】，確實在中日陶瓷貿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後，有關唐宋陶瓷給予日本窯業的影響及日本模倣中國陶瓷的對應態度和再創造，已由日方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註二六四】限於時間和筆者的能力，擬待下回有機會時再予以討論。

註釋

- 【註一】：中山平次郎，〈口元を有せる一種の白磁〉，《考古學雜誌》六卷八號（一九一六），頁三二—四七。
- 【註二】：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九七五）。
- 【註三】：日本貿易陶磁研究會，《日本貿易陶磁文獻目錄I——發掘調查報告書等——一九〇一年—一九八四年》，（福岡：日本貿易陶磁研究會，一九八

五），所收「前言」參照。

【註四】：歷年來日本遺跡發掘出土的中國陶瓷確實總數不易估計，但若以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九年由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所主持的全國性調查為例，見於發掘報告書的中國陶瓷標本達十萬件以上。參見：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日本出土的貿易陶瓷》西日本編一一三；東日本編一一二，（千葉：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一九九三、一九九四）之各編「後記」參照。

【註五】：龜井明德，〈日本貿易陶瓷研究之方法論〉，《中國古代貿易陶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一九九四），頁一五二。

【註六】：《世界考古學大系》（三）日本I，（東京：平凡社，一九五九），頁二二—二三。此參見：楊泓，〈吳、東晉、南朝的文化及其對海東的影響〉，《考古》一九八四年六期，頁五六七。

【註七】：楊泓，〈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對外影響〉，《文物》一九八四年九期，頁五〇。蘇哲，〈日本藤之木古墳出土馬具紋飾初探〉，《考古學研究》一期（一九九二），頁三八—四一五參照。

【註八】：王仲殊，〈論日本出土的青龍三年銘方格規矩四神鏡——兼論三角緣神獸鏡為吳的工匠在日本所作——〉，《考古》一九九四年八期，頁七二八。

【註九】：王仲殊，〈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綜論〉，《考古》一九八四年五期，頁四六八—七九。同氏，〈從日本出土的銅鏡看三世紀倭與中國江南的交往〉，《華夏考古》一九八八年二期，頁七六—七九轉六八。

【註一〇】：坂元義種，〈倭の五王——空白の五世紀〉，（東京：教育社，一九八一），頁三四—五一參照。

【註一一】：謝明良，〈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組合特徵及其有關問題〉，《故宮學術季刊》八卷一期（一九九〇），頁二三—二八。

【註一二】：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時代陶磁〉，《日本出土的中國陶磁》收（東京：東京美術，一九七八），頁一〇五—一六。

【註一三】：三上次男，〈漢江地域發見的四世紀越州窯青磁と初期百濟文化〉，《朝鮮學報》八十一期（一九七六），頁三五七—八〇。大韓民國文化財管理局編（永島暉臣慎譯），《武寧王陵》，（東京：學生社，一九七四），頁四〇—四一。另可參見：國立清州博物館，《韓國出土中國陶磁特別展》，（清州：國立清州博物館，一九八九），圖三一—二。

【註一四】：門田誠一，〈百濟の地方支配と中國陶磁——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冊封、除爵と領域支配の考古學的検討のために〉，《貿易陶磁研究》十三號（一九九三），頁五〇—六四。

【註一五】：門田誠一，同【註一四】，頁六一—六二。三上次男，〈百濟武寧王陵出土の中國陶磁とその歷史的意義〉，《古代東アジア史論集》下卷收，（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七八），頁一八四。

【註一六】：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有學者推測日本古墳極有可能會出土越窯系青瓷。如長谷部樂爾，《原色日本の美術》三〇卷《請來美術（陶藝）》，（東京：小學館，一九七二），頁一六八。矢部良明，同【註一二】，頁一〇六亦認為今後有可能陸續出土。

日本出土唐宋時代陶瓷及其有關問題

- 【註一七】：如楊泓，同註（註六），頁五七〇指出日本須惠器中的多管飾壺與南方六朝墓出土的五聯罐有相似之處。我也曾推測須惠器之長頸瓶有可能是受到南朝文物的影響，參見：謝明良，〈江西六朝墓出土陶瓷綜合探討〉，《故宮學術季刊》七卷三期（一九九〇），頁六四，但均止於臆測的階段。
- 【註一八】：茂在寅男等，〈遣唐使研究と史料〉，（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七），頁三一—一九。
- 【註一九】：如龜井明德，〈唐三彩の道〉，《Museum Kyushu》二卷二號（一九八二），頁二二—二三等文。
- 【註二〇】：龜井明德，〈初期輸入陶磁器の受容構造的特質〉，原載《九州歴史資料館一〇周年記念，大宰府古文化論叢》下卷，後增補收入同氏《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一九八五），頁一五—三七。
- 【註二一】：謝明良，〈日本出土唐三彩及其有關問題〉，《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一九九四），頁二一九—二〇（附表）參見。此外，報載九州大宰府千足町遺跡亦出土有唐三彩。見：〈唐三彩片出土・太宰府市千足町遺跡〉，《西日本新聞》一九九一年八月九日；〈大宰府政廳の國際性裏付け〉，《西日本新聞》一九九一年八月十日。
- 【註二二】：此轉引自矢部良明，〈日本陶磁の二萬二千年〉，（東京：平凡社，一九九四），頁一四〇。
- 【註二三】：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建造物研究室・歷史研究室（八賀晉），〈大安寺發掘調查概報〉，《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年報》（一九六七年度），頁一一五。澤田正昭等，〈大安寺出土陶枕の製作技法と材質〉，《古文化財の自然科學的研究》（京都：同朋社，一九八四），頁二四—二四九。
- 【註二四】：藤岡了一，〈大安寺出土の唐三彩〉，《日本美術工藝》四〇一號（一九七二），頁六一。
- 【註二五】：岡崎敬，〈近年出土の唐三彩について——唐、新羅と奈良時代の日本〉，《Museum》二九一號（一九七五），頁二二。
- 【註二六】：謝明良，〈唐三彩の諸問題〉，《美學美術史論集》五輯（一九八五），頁一一三。
- 【註二七】：藤岡了一，〈越州窯の壺——御物四耳壺其他〉，《陶磁》一二卷一期，頁一一—一八。矢部良明，同【註二二】，頁二〇七。
- 【註二八】：龜井明德，〈法隆寺傳世青磁四耳壺の請來をめぐって〉，同氏前引書收，頁三六—四八。
- 【註二九】：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編，〈平城京左京八條三坊發掘調查概報——東市周邊東北地域の調査〉（奈良：一九七六），參見龜井明德，同【註二八】，頁三八。過去也有人主張該青瓷罐屬八世紀時期作品，如矢部良明，同【註二二】，頁一〇九。
- 【註三〇】：矢部良明，同【註二二】，頁一〇七。
- 【註三一】：土橋理子，〈日本出土の古代中國陶磁〉，檀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貿易陶磁》收，（京都：臨川書店，一九九三），頁三三一。
- 【註三二】：藤岡了一，〈隋唐の白磁と黑磁〉，《世界陶磁全集》九卷（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一九五六），頁一八五。
- 【註三三】：長谷部樂爾，〈唐代陶磁史素描〉，《唐磁》收（東京：根津美術館，一九八八），頁九。
- 【註三四】：西田宏子（前引《唐磁》頁八一之作品解說）曾指出類似的白瓷硯可見於山東省曲阜縣宋家窯村與泗水縣尹家城窯址出土標本，報告參見：宋百

川等，（山東曲阜、泗水隋唐瓷窯址調查），《考古》一九八五年一期，頁三九圖六之一。此外，近年來於山東棗莊窯址亦出土了類似的圓硯標本，報告參見：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宋百川等，（山東棗莊中陳郝瓷窯址），《考古學報》一九八九年三期，頁三七二圖十之一三。

【註三五】：檜崎彰一，『三彩 綠釉』日本陶磁全集五（東京：中央公論社，一九七七），頁四六。

【註三六】：朝日町教育委員會，『朝日町文化財繩生廢寺跡發掘調查報告』，朝日町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一冊（一九八八），此參見：小玉道明，（繩生廢寺），『佛教藝術』一七四號（一九八七），頁六四—六八。

【註三七】：上原真人，（繩生廢寺の舍利容器），『佛教藝術』一八八（一九九〇），頁一九—三二。

【註三八】：謝明良，同【註二二】，頁二〇五。

【註三九】：湖北省博物館等（全錦雲），（湖北鄭縣李徽、閻婉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七年八期，圖版肆之三。

【註四〇】：奈良市教育委員會，（平城京左京七條二坊六坪（九三三）の調査），『奈良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昭和六〇年度』（一九八六），此參見：岡崎敬，『中國の考古學・隋唐篇』，（京都：同朋社，一九八七），頁三七〇。

【註四一】：奈良市教育委員會，（平城京右京五條一坊十五坪の調査第二七次），『奈良市埋藏文化財調查概要報告書昭和六二年度』（一九八八），此參見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等，『平城京展』，（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本社，一九八九），圖一一二及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頁三七六—七七。

【註四二】：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龍田御坊山古墳），『奈良縣史跡名勝天然記念物調查報告書第三三冊』（一九七七），此參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同【註三一】，頁三七八—七九及圖版二五。

【註四三】：持朝鮮半島說者如：檜崎彰一，同【三五】，頁四七；矢部良明，同【註二二】，頁一〇七。持中國製說法的學者甚多，如岡崎敬，（唐三彩長頸花瓶），『宗像沖ノ島』I本文篇收（宗像大社復興期成會，一九七九），頁三七二。龜井明德，同【註二六】引書，圖版五之二〇等文參見。

【註四四】：吉田惠二，（中國古代に於ける圓形硯の成立と展開），『國學院大學紀要』三〇（一九九二），頁一七二。李知宴，（日本出土の綠釉滴足硯考——併せて唐代彩釉瓷の發展について考え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引書收，頁二二—二九。

【註四五】：土橋理子，（奈良縣出土輸入陶磁について），『考古學論考』七（一九八二），頁五〇。

【註四六】：龜井明德，同【註二〇】，頁一七。

【註四七】：此係筆者依據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頁三二〇—八七所收「出土一覽表」計算得來。

【註四八】：龜井明德，同【註二〇】，頁一一七，認為日本極少出土長沙窯是與當時日本人的嗜好有關。

【註四九】：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跡——昭和五六年度調査概報』（一九八二），頁二三及頁二二三圖八三青瓷花口杯。另可參見：龜井明德，（唐代陶磁貿易の展開と商人），『アジアの中の日本史Ⅲ海上の道』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二），頁一三三。

日本出土唐宋時代陶瓷及其有關問題

【註五〇】：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跡——昭和六一年度調査概報》（一九八七），頁七一圖四五之九七及圖版五四A。

【註五一】：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跡——昭和五一年度調査概報》（一九七七）。不過上引原發掘報告書並未記載出土青瓷，此轉引自樞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頁二四七等。

【註五二】：太宰府市教育委員會，《大宰府條坊跡Ⅲ》大宰府市の文化財第八集（一九八四），此參見：樞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同【註三一】，頁二四七等。

【註五三】：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跡——昭和五七年度調査概報》（一九八三）頁六〇及圖版五二之三七。

【註五四】：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跡——昭和五九年度調査概報》（一九八五）此參見：樞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頁二四七及頁一六二—一六三。

【註五五】：岡市教育委員會，《柏原遺跡群Ⅵ——古墳、古代遺跡M遺跡の調査——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一九一集（一九八八），頁二四—二五；另參見樞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同【註三一】，頁二四七等。

【註五六】：土橋理子，同【註三一】，頁二三四。

【註五七】：轉引自：樞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頁二四七等。

【註五八】：三次市教育委員會，《備後寺町廢寺》（一九八二），此參見：矢部良明，〈唐三彩から奈良三彩へ〉，《考古學ジャーナル》一九六號（一九八六）臨時增刊號，頁三二。

【註五九】：高倉洋彰等，〈觀世音寺出土の唐三彩〉，《考古學雜誌》六四卷一期（一九七八），頁八一。橫田賢次郎，〈大宰府出土の唐三彩絞胎陶〉，《考古學ジャーナル》，一九六號（一九八二），頁二二。此外，龜井明德，同【註二〇】，頁一七亦持類似的看法。

【註六〇】：這點已由長谷部樂爾氏所指出。參見：同氏，〈中國陶磁の輸出と日本〉，《MUSEUM》二九一號（一九七五），頁五。另外，依據近年來研究者對於九州鴻臚館和太宰府遺跡所出中國陶磁的再檢討，也認為白瓷和越窯系青瓷早自八世紀後半至遲於九世紀初已經輸入日本。參見：橫田賢次郎等，〈大宰府鴻臚館出土の初期貿易陶磁の検討〉，《貿易陶磁研究》一四號（一九九四），頁一〇。

【註六一】：朝鮮半島出土的唐三彩計有以下四例。即：慶州朝陽洞（鍍）、皇龍寺（枕）、味吞寺（枕）、月城（鈴）。參見：國立清州博物館，同【註一三】，頁二圖一七，頁一三圖二〇—二二。

【註六二】：三上次男，〈中東イスラム遺跡における中國陶磁——第二報——〉，收入《石田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東洋文庫，一九六五），頁四六〇。

【註六三】：馮先銘，〈泰國、朝鮮出土中國陶瓷〉，《中國文化》二期（一九九〇），頁五九。此外，印尼雅加達國立博物館（Museum Pusat - Jakarta）收藏有數件傳說出土於印尼諸島的唐三彩，可惜未見正式發掘報告，詳情不明。如佐藤雅彥等編，《東洋陶磁》三ジャカルタ國立博物館，（東京：講談社，一九八一）圖六蘇門答臘出土的三彩壺。

【註六四】：主張中國貿易瓷始於九世紀的學者甚多，如三上次男，〈朝鮮半島出土的唐代陶磁とその史的意義〉，《朝鮮學報》八七輯（一九七八），頁三二。另一方面，從個別研究者歷年的論著中，亦可窺知該一見解有逐漸變化的跡象。如龜井明德，同【註一九】，頁二二—二二（一九八二）認為唐三彩非貿易瓷，暗示中國貿易瓷始於九世紀，其後則又主張中國貿易瓷有可能始於八世紀後半，但仍慎重地要期待日後的資料來證實（同【註二〇】，（一九八五），頁一三一）。最近，同氏既相信中國外銷陶瓷於八世紀後半已明確出現（同氏，註【四九】，（一九九二），頁二五—二六），同時又認為並無八世紀末以前貿易瓷輸入的證據（頁一三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掙扎和抵抗，或許是因為如果承認日本出土的八世紀後半青瓷等作品屬貿易瓷，那麼就不得不重新面對八世紀前半唐三彩的性質問題。

【註六五】：附帶一提，西亞文獻中亦見幾則中國早期貿易瓷資料。除了察希茲（Al-Jahiz，七七九—八六九年）所著《守財奴》中提到一件「有斑紋的中國陶器」（岡崎敬，〈東西交涉の考古學〉（東京：平凡社，一九七三），頁三八九），同書並載有一份自中國進口陶瓷的貿易協議（歐志培，〈中國古代陶瓷在西亞〉，《文物資料叢刊》二（一九七八），頁一三一）。其次，他巴里（Tabari，836-923年）《年代記》中的「彩色、覆金的中國器」也被推測可能是加金裝的「唐三彩」（愛宕松男，〈東西交涉史における中國陶瓷、特に輸送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東洋史學論集》第一卷《中國陶瓷產業史》收，（東京：三一書房，一九八七），頁四四八—四四九）。十一世紀波斯歷史學家貝伊哈齊（Bayhaqi，995-1077年）記述說哈里發哈倫·拉施德在位（七八六—八〇六年）間，呼羅珊總督阿里·本·愛薛（Ali ibn al-Ash'ath）曾向巴格達的哈里發貢獻了二千件精美的日用瓷器，其中包括了二十件連哈里發宮廷也從沒見過的二十件（俄文本譯二百件）「中國天子御用的瓷器」（chini-faghar）（張廣達，〈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頁四五—）。此外，從史料看，八世紀後半巴格達似大量使用中國陶瓷（參見：佐佐木達夫，〈英國的博物館所藏的遺蹟出土中國陶磁器〉，《金澤大學文學部論集》史學科篇，六號（一九八六），頁二）。

【註六六】：三上次男，同【註六四】，頁一七圖二〇。

【註六七】：龜井明德，同【註四九】，頁二〇。

【註六八】：矢部良明，〈日本陶磁の一萬二千年〉，（東京：平凡社，一九九四），頁一五六。

【註六九】：參見：檀原考古學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引書，頁三二〇—八七「出土一覽表」。此外，近年來於九州宗像地區新發現的越窯青瓷可參見：白木英敏等，〈宗像地域出土の越州窯青磁について〉，《福岡考古》一六（一九九四），頁八七—九二。

【註七〇】：龜井明德，〈日本出土の越州窯陶磁器の諸問題〉，同【註二六】引書，頁五二及五三—五七遺跡地名表。

【註七一】：龜井明德〈日宋貿易關係の展開〉，收於岩波講座《日本通史》古代六（東京：岩波書店，一九九五），頁二二—四。

【註七二】：經常被引用做為說明唐物公易使到達之前，大宰府地區富豪層即先行購買唐物的文獻記載是《日本三代實錄》四八所載：仁和元年（八八五年）「大唐商賈人著大宰府，是日，下知府司，禁王臣家使及管内吏民，私以貴直，競買他物」及延喜三年（九〇三年）：「唐人商舶來著之時，諸院諸

宮諸王臣家等，官使未到之前，遣使爭買，又郭內富豪之輩，心愛遺物，踊直貿易」。參見：木宮泰彥著（陳捷譯），《中日交通史》（台北：九思出版社，一九七八），頁一五四。

【註七三】：由於福岡市柏原M遺跡既出土了越窯，長沙窯及白瓷等九世紀貿易瓷，同時伴出了外側墨書「鄉長」的日本國產土師器碗，（參見：福岡市教育委員會，同註（五五），頁二一八圖三之一），故近年龜井明德氏據此主張中國初期輸入陶瓷於日本的使用層可擴及至鄉長階層。參見：同氏，同【註四九】，頁二二七—二三八。不過從日本出土越窯遺跡亦包括部分集落居住地等情形看來，似不應排除庶民或亦有少量使用的機會。

【註七四】：朱伯謙，《越窯》，中國陶磁全集四（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一九八一），頁一八六。

【註七五】：如龜井明德，同【註二〇】，頁一一五—一二六；同【註四九】，頁一二六。

【註七六】：前川要，〈平安時期における施釉陶磁器の様式論的研究〉，《古代文化》一九八九年一〇期，頁三一。

【註七七】：龜井明德，《九州の中國陶磁》（福岡：財團法人西日本文化協會，一九八七），頁八圖。

【註七八】：龜井明德，同註【七七】，頁九圖。

【註七九】：矢部良明，同【註一二】，頁一二二。龜井明德，同【註七〇】，頁六八。

【註八〇】：森田勉，〈北九州地方から出土する越州窯青磁の様相〉，《考古學ジャーナル》二二一號（一九八二），頁一八。

【註八一】：類似的胎釉及褐斑裝飾均與婺州窯青瓷類似，可參見：貢昌，《婺州古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八），圖版拾肆左上。另，朱土生，〈浙江龍游方坦唐乳濁釉瓷窯址調查〉，《考古》一九九五年五期圖版貳之三、五。

【註八二】：揚州博物館（吳煒等），〈揚州教育學院內發現唐代遺跡和遺物〉，《考古》一九九〇年四期，圖版肆之四。

【註八三】：如婺窯系之江山縣達瓏窯作品底部即以五至七只墊珠墊燒。參見：貢昌，〈唐代婺州窯概況〉，《中國古陶瓷研究》二輯（一九八八），頁二八。

【註八四】：金祖明，〈台州窯新論〉，《東南文化》一九九〇期六期，頁一五五。另，圖參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同【註二】，圖六、一〇、一一、一三。

【註八五】：參見：百瀨正恆等，〈日本における白磁出土地名表〉，《古代文化》三四卷一期（一九八二），頁二六—二七；龜井明德，〈初期輸入陶磁器の名稱と實體〉，同氏同【註二〇】引書，頁一一—一三「邢州窯樣式白磁出土地名表」；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頁三二〇—八七「出土一覽表」。

【註八六】：馮先銘，〈談邢窯有關諸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四期，頁五三。

【註八七】：龜井明德，〈唐代玉璧高台の出現と消滅時期の考察〉，《貿易陶磁研究》一三（一九九三），頁一一〇。

【註八八】：河北臨城邢窯研製小組（楊文山等），〈唐代邢窯遺址調查報告〉，《文物》一九八一年九期，頁四一圖四、五，頁四二圖一〇、一一。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林洪），〈河北曲陽縣潤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一九六五年八期，圖版六之一、三。

【註八八】：持該一論點的人頗多，較具代表性的：有矢部良明，（晚唐五代的陶磁），《世界陶磁全集》隋唐篇收，（東京：小學館，一九七六），頁二八五；長谷部樂爾，（中國陶磁の傳世について），《MUSEUM》三五六號（一九八〇），頁七，龜井明德，同【註七】，頁七五。最近，長谷部樂爾氏則又認為日本奈良、平安時期遺跡除了出土有少量的邢窯或定窯白瓷，另有大量的白瓷產地不明。參見同氏，（中國陶磁と日本の交流諸問題），《東洋陶磁》第二十五號（一九九六），頁五〇。

【註九〇】：龜井明德，同【註八五】，頁一〇八。該文曾於八十年代由作者增補註記，既同意日本出土的白瓷除少部分標本與邢窯特徵相符之外，多數作品與河北定窯特徵一致，但仍主張該類白瓷有可能是包括廣東在內的江南地方窯所生產。

【註九一】：如長沙出土的唐五代白瓷曾被疑為係當地所產。參見：高至喜，〈長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一九八四年一期，頁九一；李輝柄，〈關於「官」「新官」款白瓷產地問題的探討〉，《文物》一九八四年二期，頁六二。

【註九二】：寺島孝一，〈平安京西寺跡出土の白磁〉，《古代文化》三四卷二期（一九八二），頁二四—二五。

【註九三】：廣州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管理科（黃流沙等），〈舉辦「廣州市一年來生產建設中出土古文物展覽」的經驗和體會〉，《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四年八期，頁九六圖二五。

【註九四】：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三年來廣州市古墓葬的清理和發現〉，《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年五期，頁二七。

【註九五】：三上次男，〈長沙銅官窯磁——その貿易陶磁の性格と陶磁貿易〉，收於《陶磁貿易史研究》中卷，同氏著作集二（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一九八八），頁二一〇。

【註九六】：京都市埋藏文化研究所，〈京都市埋藏文化財調查概要〉，昭和六〇年度（一九八八），轉引自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同【註三一】引書，頁三六七。

【註九七】：土橋理子，同【註三一】，頁三四及二四七表一二參照。

【註九八】：全錦雲，〈武昌唐墓所見銅官窯瓷器及其相關問題〉，《考古》一九八六年二期，頁一二八圖一之三。

【註九九】：周世榮，〈略談長沙王清墓與出土瓷器的窯口問題〉，《考古》一九八五年七期，頁六二—圖五之一。

【註一〇〇】：巢湖地區文物管理所（張宏明），〈安徽巢湖市唐代磚室墓〉，《考古》一九八八年六期，頁二五四圖四之一。

【註一〇一】：揚州市博物館，〈揚州發現兩座唐墓〉，《文物》一九七三年五期，頁七一圖三。

【註一〇二】：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 中國陶磁篇Ⅰ》，（東京：東京美術，一九八八），頁七九圖三〇八。

【註一〇三】：京都市埋藏文化研究所，《平安京跡發掘調查概報》昭和六一年度（一九八六），轉引自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引書，頁三六七。

【註一〇四】：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福岡市多多良込田Ⅲ 福岡市東區多的津所在遺跡群的調查》，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二二集（一九八五），轉日本出土唐宋時代陶瓷及其有關問題

引自「權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引書，頁三二二～三二三及彩圖三一。

【註一〇五】：柳澤一郎編，《多多良込田遺跡Ⅱ——福岡市東區多の津所遺跡群の調査——》（一九八〇），轉引自山崎純男，〈福岡市柏原M遺跡出土の唐三彩〉，《九州考古學》五八號（一九八三），頁二一四。

【註一〇六】：住宅、都市整備公團，《十郎川——福岡市早良平野石丸、古川遺跡》，（一九八二）轉引自「權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頁三一八～三一九。

【註一〇七】：田邊昭三，〈平安京出土の唐三彩ほか〉，《考古學ジャーナル》一九六號（一九八二），頁三三。

【註一〇八】：山崎純男，〈柏原遺跡から唐三彩出土〉，《Museum Kyushu》一〇號（一九八三），頁五〇。

【註一〇九】：福岡市教育委員會，同【註五五】，頁二〇七～九。

【註一一〇】：矢部良明，〈晚唐五代の唐三彩〉，《考古學雜誌》六五卷三期（一九七九），圖版一下。

【註一一一】：矢部良明，〈唐三彩から奈良唐三彩へ〉，《考古學ジャーナル》一九六號（一九八六），頁三二。

【註一二二】：龜井明德，〈唐三彩の道〉，《Museum Kyushu》六號（一九八二），頁二一。

【註一二三】：横田賢次郎等，同【註六〇】，頁九七～一三。

【註一二四】：如（一座談會——中國陶磁を語る（二）——三上次男氏の最近の知見を中心に——），《東洋陶磁》七卷（一九八一），頁六〇。長谷部樂爾氏等人的發言參見。

【註一二五】：田邊昭三，同【註一〇七】，頁三三。

【註一二六】：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建造物研究室、歷史研究室（八賀晉），同【註二三】，頁三圖二之一〇。

【註一二七】：田邊昭三，同【註一〇七】，頁三三。

【註一二八】：京都市埋藏文化研究所，《平安京跡發掘概報》昭和五十七年度（一九八三），轉引自：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日本出土の貿易陶磁》西日本篇一（千葉：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一九九三），頁八四。

【註一二九】：京都市埋藏文化研究所，《平安京跡發掘資料選》（一九八〇），轉引自：田邊昭三，同【註一〇七】，頁三三～三五及頁二四圖一。

【註一二〇】：横田賢次郎，〈大宰府出土の唐三彩と絞胎陶〉，《考古學ジャーナル》一九六號（一九八六）臨時增刊號，頁二二及同頁圖四。

【註一二一】：謝明良，同【註二一】頁二〇〇。

【註一二二】：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同【註一〇二】，頁六九圖二六八。其餘類似定年的例子甚多，此處不再徵引。

【註一二三】：劉建洲，〈鞏縣唐三彩窯址調查〉，《中原文物》一九八一年三期，頁一六一～一二。

- 【註一二四】：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敏等），〈河北省內丘縣邢窯調查簡報〉，《文物》一九八七年九期，頁一一一〇。
- 【註一二五】：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銅川工作站（祿振西），〈銅川黃堡發現唐三彩作坊和窯爐〉，《文物》一九八七年三期，頁三三三—轉三七。
- 【註一二六】：鄭州市文物工作隊（陳立信），〈河南滎陽茹崗發現唐代窯址〉，《考古》一九九一年七期，頁六六四—六六六。
- 【註一二七】：如秦浩，〈略論揚州唐墓的幾個問題〉，《揚州師院學報》一九八六年四期，頁一九四。李知宴，《中國釉陶藝術》，（香港：輕工業出版社+兩木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三七。
- 【註一二八】：劉建洲，〈鞏縣黃冶「唐三彩」窯陶瓷玩具〉，《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五年二期，頁三三—三六。
- 【註一二九】：柘原市教育委員會，〈藤原京京二條三坊跡より三彩の備片が出土〉，《考古學ジャーナル》三三四號（一九九一），頁四四—四五。彩圖見：奈良縣柘原市教育委員會，圖錄《柘原市の文化財》（奈良：柘原市教育委員會，一九九五），頁八五圖右下。
- 【註一三〇】：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建造物研究室、歷史研究室（八賀晉），同【註二三】，頁三圖二參照。
- 【註一三一】：橫田賢次郎等，同【註一二〇】，頁二〇。
- 【註一三二】：田邊昭三，同【註一〇七】，頁三—二五。
- 【註一三三】：佐久市教育委員會，〈前田遺跡（第Ⅰ、Ⅱ、Ⅲ）次〉，轉引自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日本出土の貿易陶磁》（東京：千葉：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博物館資料調查報告書五，一九九四），頁二四。
- 【註一三四】：田邊昭三，〈古代史發現の旅〉（東京：角川書店，一九九〇），轉引自王維坤，〈中國唐三彩與日本出土的唐三彩研究綜述〉，《考古》一九九二年二期，頁一二七。
- 【註一三五】：田邊昭三，同【註一〇七】，頁三。
- 【註一三六】：濱松市立郷土博物館，〈濱名郡可美村城山遺跡範圍確認調查概報〉（一九七八）；參見：辰巳均，〈城山遺跡と唐三彩〉，《考古學ジャーナル》一九六號（一九八一），頁三一—一七。
- 【註一三七】：石田廣美，〈大畑Ⅰ遺跡——堆生郡衙推定地——の調査〉，《日本歴史》四二〇號（一九八四），頁八八—九七。
- 【註一三八】：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建造物研究室、歷史研究室（八賀晉），同【註二三】，頁三圖二之一〇。
- 【註一三九】：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跡平成元年度發掘概報〉（一九九〇），圖版六八a,b。
- 【註一四〇】：〈安倍寺跡環境整備事業報告——發掘調查報告〉，《日本考古學年報》（一九七〇），參見：矢部良明，同【註一一一】，頁三〇—三三。
- 【註一四一】：高倉洋彰等，同【註五九】，頁七六圖五。
- 【註一四二】：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敏等），同【註一二四】，頁九圖一七參見。

【註一四三】：岡崎敬，〈唐三彩長頸花瓶〉，收入第三次沖ノ島學術調查隊編，《宗像沖ノ島》I本文篇，（宗像大社復興與期成會，一九七九），頁三七七。

【註一四四】：茂在寅男，同【註一八】，頁二九。

【註一四五】：小田富士雄，〈北海道中—大陸と沖ノ島祭祀〉，收入同氏編，《古代を考える沖ノ島と古代祭祀》，（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八八），頁二五五。

【註一四六】：森克己，〈遣唐使〉，（東京：至文堂，一九六六），頁五二。

【註一四七】：白化文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九五—九六。

【註一四八】：李廷先，〈唐代揚州史考〉，（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頁四七一。

【註一四九】：森克己，同【註一四六】，頁一二二。

【註一五〇】：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博物館中國の博物館I〉，（東京：講談社，一九八一），圖七四。

【註一五一】：洛陽市博物館，〈洛陽唐三彩〉，（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圖一一八。

【註一五二】：洛陽市博物館，同【註一五一】，圖一一七。

【註一五三】：蔣華，〈江蘇揚州出土的唐代陶瓷〉，《文物》一九八四年三期，頁六七圖一四、一五。

【註一五四】：揚州例參見：蔣華，同【註一五三】，頁六七圖八。

【註一五五】：常博，〈常州市出土唐三彩瓶〉，《文物》一九七三年五期，頁七二。

【註一五六】：胡友成，〈江蘇武進發現唐三彩高頸瓶〉，《考古》一九九五年七期，頁六七一。

【註一五七】：揚州市博物館（王勤金等），〈揚州邗江縣楊廟唐墓〉，《考古》一九八三年九期，頁八〇—圖二之一〇。

【註一五八】：南京博物院等（曾昭燁），〈江蘇省十年來考古工作中的重要發現〉，《考古》一九六〇年七期，圖版二之二。

【註一五九】：王勤金，〈揚州大東門基建工地唐代排水溝等遺跡的發現和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五年三期，頁四六。

【註一六〇】：蔣華，同【註一五三】，頁六七圖二。

【註一六一】：揚州市博物館，〈揚州發現兩座唐墓〉，《文物》一九七三年五期，頁七一圖四。

【註一六二】：蔣華，同【註一五三】，頁六七圖七。

【註一六三】：劉建洲，同【註一二三】，圖版肆之一；同【註一二八】，頁三四圖一之三。

【註一六四】：揚州博物館（吳煒等），同【註八二】，頁三四三。

【註一六五】：揚州博物館（馬富坤等），〈揚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調查〉，《文物》一九八五年一〇期，頁七四。

【註一六六】：李知宴，〈青花起源和唐代青花瓷器的特點〉，《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一三至一四期（一九八九），頁一五四。

【註一六七】：文化部文物局揚州培訓中心（張浦生等），〈揚州新發現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文物》一九八五年一〇期，頁七一。陳堯成等，〈唐代青花瓷用鈷料來源研究〉，《中國陶瓷》，一九九五年二期，頁四〇—四四。

【註一六八】：傅築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二三六。

【註一六九】：李則斌，〈揚州新近出土的一批唐代文物〉，《考古》一九九五年二期，頁一〇二、一四七。

【註一七〇】：如揚州博物館（吳煒等），同【註一八二】，頁三四一；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揚州城考古隊（王勤金），〈江蘇揚州市文化宮唐代建築基址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九四年五期，頁四一九。

【註一七一】：揚州博物館（馬富坤等），同【註一六五】，頁七三。

【註一七二】：《經國集》參見：瑯保己一編，《群書類從》第八輯卷一百二十五，（東京：群書類從完成會，一九八〇年收），頁五三六—三七。另據《日本逸史》載天長四年（八二七年）「詔中納證三位良峰朝臣安世、東宮學士、從五位下滋野朝臣貞主等，撰近代詩人所作之詩，勒作兩帙，名曰經國集」。此參見：物集高見等，《廣文庫》第七冊《經國集》條（東京：名著普及會，一九七六），頁三四八。

【註一七三】：顧風，〈略論揚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發現的意義〉，收入《中國古代陶瓷的外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七。

【註一七四】：東京國立博物館，〈日本出土の舶載陶磁—朝鮮、ベトナム・タイ・イスラム〉，（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九九三），頁二四圖二四。鈴木重治，〈日本出土のイスラム陶器の検討〉，收入《三上次男博士喜壽紀念論文集》陶磁篇（東京：平凡社，一九八五），頁三〇三—一二一。

【註一七五】：何翠媚，〈佐佐木達夫等譯〉，（九一—〇世紀の東、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西アジア陶器の意義），《貿易陶磁研究》一四號（一九九四），頁四五。

【註一七六】：龜井明德，同【註七七】，頁八圖。

【註一七七】：揚州博物館（吳煒等），同【註一八二】參見。另外，揚州三元路出土的青瓷褐彩鉢，底部有七支燒點，可能亦為婺州窯系作品。報告參見：揚州博物館（馬富坤等），同【註一六五】，頁七四。

【註一七八】：三上次男，〈長沙銅官窯—その貿易陶磁の性格と陶磁貿易〉，收入《陶磁貿易史研究》中卷（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一九八八），頁二二九。

【註一七九】：周世榮，〈湖南陶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二七五。

【註一八〇】：朱江，〈揚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壺〉，《文物》一九八三年二期，頁九五圖一。

【註一八一】：周長源等，〈試論揚州南天大廈工地出土的唐代長沙窯瓷器〉，收入《中國古陶瓷研究會 九四年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博物院，一九九四），頁六八。

【註一八二】：李廷先，同【註一四八】，頁三七五。

【註一八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揚州城考古隊（王勤金），同【註一七〇】，頁四二〇。

【註一八四】：土橋理子，同【註三一】，頁二六表五一六參見。

日本出土唐宋時代陶瓷及其有關問題

- 【註一八五】：朱江，同【註一八〇】，頁九五。
- 【註一八六】：Ho Chuimei, *Chinese Presence in Southern Thailand before 1500AD from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China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P291。陳達生，〈唐代絲綢之路的見證——泰國猜耶出土瓷碗和揚州出土青水壺上阿拉伯文圖案的鑑定〉，《海交史研究》一九九二年二期，頁四〇—四一轉五五。陳文並指出揚州青水壺的阿拉伯文應為“Allah”（安拉）一詞的對稱寫法。
- 【註一八七】：三上次男，〈イラン發見の長沙銅官窯瓷と越州窯青磁〉，《東洋陶磁》四期（一九七七），頁二〇。
- 【註一八八】：三上次男，同【註一七八】，頁一三三。
- 【註一八九】：梢崎彰一，〈畿内および東日本の彩釉陶器〉，收入《日本の三彩と綠釉》（東京：五島美術館，一九七四），頁一九二。此外，奈良彩釉器中的圈底鉢除有可能做自唐代金屬鉢之外，也有可能與唐代的黑陶同式鉢有關。參見：謝明良，〈唐代黑陶鉢雜識〉，《故宮文物月刊》二三卷九期（一九九五）頁一一三—一四。
- 【註一九〇】：奧平武彦，〈朝鮮出土の支那陶磁器雜見〉，《陶磁》九卷二期（一九三七），頁一〇。
- 【註一九一】：如龜井明德氏於同【註二〇】，頁一一七既承認長沙窯的裝飾具西亞作風故未能博得日本的歡迎，但於同【註四九】，頁二二〇及同【註七一】，頁一一五卻又主張各國對於唐代陶瓷的輸入只能是全盤地接受，不存在選擇權。
- 【註一九二】：田島公，〈日本、中國、朝鮮對外交流年表〉，收入《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同【註三一】》，頁一一二〇參照。
- 【註一九三】：龜井明德，同【註四九】，頁一一八—一九，另同【註七〇】，頁七八—八四參照。
- 【註一九四】：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二二四。
- 【註一九五】：寧波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林士民，〈寧波東門口碼頭遺址發掘報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一九八一年刊），頁一一三。
- 【註一九六】：如林士民，〈試論明州港的歷代青瓷外銷〉，《海交史研究》第五輯（一九八三）頁九八—一〇四。同氏，〈古代的港口城市——寧波〉，《海交史研究》三（一九八一），頁六七。李知宴，〈越窯與銅官窯磁器的發展與輸出〉，《貿易陶磁研究》二（一九八二），頁一八等文。
- 【註一九七】：田島公，同【註一九二】，頁八二。
- 【註一九八】：何翠媚，〈土橋理子譯〉，〈唐代末期における廣東省の窯業および陶磁貿易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二二號（一九九二），頁一五九—八四。
- 【註一九九】：龜井明德，〈平安、鎌倉時代の輸入陶磁器〉，同【註二〇】引書，頁一五五—五六。
- 【註二〇〇】：矢部良明，同【註六八】，頁一五六。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日本の陶磁》（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九八五），頁一二七。
- 【註二〇一】：陳高華等，《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頁六二—七〇參照。
- 【註二〇二】：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同【註二一】引書，頁四八圖一六七。

【註二〇三】：龜井明德，〈草創期龍泉窯青磁の映像〉，《東洋陶磁》一九九號（一九九二），頁一一圖六參照。另，《博多四十七—第六十四次調査報告—》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三九八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一九九五），頁一九五圖一二之三二七。

【註二〇四】：茶の湯懇談會編，〈山上宗二記研究〉二，（東京：三德庵，一九九四），頁九三。

【註二〇五】：長谷川道隆，〈珠光青磁について—その過去と現在の評價〉（上），《陶說》三九〇號（一九八五），頁三二—二八。

【註二〇六】：李輝柄，〈福建同安窯址調査紀略〉，《文物》一九七四年二期，頁八〇—八四。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林釗），〈同安縣汀溪水庫古瓷窯調査記〉，《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二期，頁三二—三三。

【註二〇七】：林忠干等，〈同安窯系青瓷の初步研究〉，《東南文化》一九九〇年五期，頁三九—一九七轉三九〇頁。

【註二〇八】：馮先銘，〈近年における陶磁考古の新成果〉，收於一九四九—一九八一近年發見の窯址出土中國陶磁展（東京：出光美術館，一九八二），無頁數。

【註二〇九】：緊水灘工程考古隊浙江組（任世龍），〈山頭窯與大白岸—龍泉東區窯址發掘報告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一九八一），頁一三〇—六六。李知宴，〈浙江龍泉青瓷山頭窯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一九八一年一〇期，頁三六—四二。

【註二一〇】：龜井明德，同【註二〇三】，頁五一—二七，及同氏，〈龍泉窯青磁創燒時期への接近〉，《貿易陶磁研究》一二號（一九九二），頁一四—一五七。

【註二一一】：森克己，〈日宋貿易の研究〉（東京：國立書院，一九四八），頁一九三。

【註二一二】：長谷部樂爾，同【註一六】，頁一七一。

【註二一三】：京都市埋藏文化研究所，〈平安京左京三條二坊京都勞働金庫予定地における發掘調査の概要〉（一九八〇），轉引自：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同【註四】引書，西日本編（一），頁一三四。另外，博多遺跡也曾出土耀州窯青瓷印花碗殘片。報告參見：《博多Ⅱ 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八四集—圖版編—》（福岡市教育委員會，一九八二）圖三〇—二二。

【註二一四】：朝倉市遺跡調査研究所，〈特別史跡—一乘谷朝倉氏遺跡Ⅵ昭和四九年度發掘調査整備事業概報〉（一九七五）；〈特別史跡—一乘谷朝倉氏遺跡Ⅶ昭和五五年度發掘調査整備事業概報〉（一九八一），均轉引自：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同【註四】引書，東日本編二，頁二六、一三三。此外，據間接的報導，博多遺跡亦曾出土紫定和耀州窯殘片，但詳情不明。參見：中澤富士雄等，〈宋元の陶磁貿易—古窯址と消費地の實態〉，《古美術》六八號，（一九八三），頁七〇。

【註二一五】：長谷部樂爾、今井敦，〈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東京：平凡社，一九九五），圖三八、三九。及龜井明德，〈日本出土の吉州窯陶器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一一（一九九一），頁二四八。附帶一提，福岡市冷泉遺跡出土的著名所謂磁州窯系綠釉剔花梅瓶，從器形、裝飾作風等推測，近年來研究者大都傾向其應屬南方瓷窯產品。後者圖參見：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瀬戸内の中國陶磁》（廣島：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友の會，一九九一），頁一三圖一九。

日本出土唐宋時代陶瓷及其有關問題

- 【註二二六】：參見，田島公，同【註一九二】，頁七九—一二〇。
- 【註二二七】：森克己，同【註二二一】，頁三六—四一。另龜井明德，〈兩浙路市舶司公憑の陶磁器〉，同【註二〇】引書收，頁一六九—八一。
- 【註二二八】：龜井明德，〈貿易陶磁史研究的課題〉，同【註二〇】引書收，頁六。
- 【註二二九】：矢部良明，同【註六八】，頁二二—三十一、四，及頁二六九。
- 【註二三〇】：矢部良明，同【註一二】，頁一二—二；同【註六八】，頁二二八。另參見：大三輪龍彦，〈鎌倉の考古學〉（東京：ニュウサイエンス社，一九八五），頁四三。
- 【註二三一】：長谷部樂爾，〈日本出土の元、明の陶磁〉，同【註一二】引書收，頁一三二。
- 【註二三二】：長谷部樂爾，〈青白磁渦文瓶〉，《古美術》三六期（一九七二），頁八四。
- 【註二二三】：中澤富士雄等，同【註二二四】頁六八。
- 【註二二四】：長谷部樂爾，同【註二二二】頁八四。
- 【註二二五】：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一九九二），頁一一六，圖二六之解說。
- 【註二二六】：東京國立博物館，同【註一二】引書，頁四三圖一五四。
- 【註二二七】：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五七），頁三一—三二之【註四〇】及頁一〇〇之【註二四三】。
- 【註二二八】：中國硅酸鹽學會，同【註一九四】頁二九四—九五。
- 【註二二九】：宿白，同【註二二七】圖版貳貳。
- 【註二三〇】：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同【註二〇〇】引書，頁一八。
- 【註二三一】：矢部良明，同【註一二】頁一三三。
- 【註二三二】：平出紀男，〈白磁四耳壺について〉，《古代文化》三五卷一一（一九八三），頁二二—四三。
- 【註二三三】：瀨戶市史編纂委員會，〈瀨戶市史陶磁篇1〉（瀨戶：瀨戶市長，一九八八新訂二版），頁一三二—五九。
- 【註二三四】：奈良國立博物館編，〈經塚遺寶〉（東京：東京美術，一九七七），頁二八三—八四。
- 【註二三五】：矢部良明，同【註一二】，頁二二〇。
- 【註二三六】：矢部良明，同【註一二】，頁一一七。
- 【註二三七】：謝明良，〈澎湖中屯嶼發現的「清園」銘瓷片和清香壺〉，《故宮文物月刊》一二卷六期（一九九四），頁三三。
- 【註二三八】：杉山洋，〈褐釉系陶器の受容と展開〉，《東アジアの考古と歴史》下卷收（京都：同朋社，一九八七），頁四二三圖二及東京國立博物館編，

同【註二】，頁一八圖三五。另外，最近的出土例可見於福岡市博多區冷泉町遺址。報告參見：《博多四十三—博多遺跡群第八十一次發掘調查報告書》、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三九二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一九九五），頁二三圖二之一四。

【註三三九】：滿岡忠成解題，〈茶具備討集〉，《茶道》卷十五（一九三七），頁五九六。

【註三四〇】：德川義宣，〈茶壺〉（研究篇），（東京：淡交社，一九八二），頁一〇〇—一四。

【註三四一】：林忠干等，〈閩北地區的名窯珍瓷〉，《福建文博》一九九三年一、二期合刊，頁八四圖下。

【註三四二】：福建省博物館等，〈福建建陽蘆花坪窯址發掘簡報〉，《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一四二，圖七之一、一三。

【註三四三】：長谷部樂爾，同【註一六】，頁一七四。

【註三四四】：藏田藏，〈經塚出土の宋磁〉，《世界陶磁全集》一〇卷收（東京：河出書房，一九五五），頁二七〇。

【註三四五】：稻垣晉也（經塚と遺物），奈良國立博物館，同【註三四】引書收，頁三〇六。

【註三四六】：稻垣晉也，同【註三四五】，頁三〇六引石田茂作氏說。另，秋山浩三，〈經塚と珠玉〉，《大阪府埋藏文化財協會研究紀要》三（一九九五年）設立十周年記念論集，頁一九五—二一四參照。

【註三四七】：岡崎讓治等，〈種類別經塚遺物〉，奈良國立博物館，同【註三四】引書收，頁四五〇。

【註三四八】：矢部良明，同【註二二】，頁一七三。

【註三四九】：有趣的是，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有一件一九三〇年代得自山西的日延長三年（九二五）銘銅經筒，推測是平安朝日本僧人詣五台山時所攜來，這是日本以外唯一可能出土有經筒的例子，可惜詳情不明。參見：石志廉（日本延長三年道賢法師經筒），《中國歷史博物館刊》六期（一九八四），頁一一—三二。

【註三五〇】：藏田藏，同【註三四四】，頁二六八。

【註三五一】：龜井明德，同【註七〇】，頁五〇。

【註三五二】：如最近今井敦氏所指出，建於日延喜四年（九〇四年）仁和寺圓堂遺跡與越窯青瓷伴隨出土的一件白瓷盒之胎和釉，有異於一般所見北方白瓷。同氏並再度強調日本出土中國歷代陶瓷多來自中國南方窯場，故從流通層面而言，不能排除初期輸日貿易瓷當中，於日本遺跡出土數量僅次於越窯青瓷的晚唐白瓷有產自南方的可能性（今井敦，〈中晚唐の中國陶磁〉，《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三十一號，一九九六，頁八四—八五）

【註三五三】：馮先銘，〈河南鞏縣古窯址調查記要〉，《文物》一九五九年三期，頁五六圖三。

【註三五四】：森本朝子，〈博多遺跡群出土の天目〉，《茶道資料館（唐物天目）》收（京都：茶道資料館，一九九四），頁一九四—二四。

日本出土唐宋時代陶瓷及其有關問題

- 【註二五五】：森本朝子，同上註。另，今泉雄作，〈君台觀左右帳記考証〉，《國華》四〇號（一九九三），頁七三—七七。
- 【註二五六】：伊藤嘉章，〈和物天目—瀬戸・美濃における天目の展開〉，前引《唐物天目》頁三二—二九。
- 【註二五七】：福建省博物館等（林忠干等），〈福建南平宋元窯址調查簡報〉，《福建文博》一九八三年一期，頁六〇—圖四一。
- 【註二五八】：李知宴等，〈關於軍持的幾個問題〉，《海交史研究》四期（一九八二），頁八五。
- 【註二五九】：滿岡忠成，〈日本人と陶器〉（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會社，一九四五）第二章（茶陶鑑賞史），參照。
- 【註二六〇】：這點亦可由茶碗的使用變遷窺知。見：林屋晴三，〈茶碗變遷資料〉，《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五號（一九七〇），頁一二—二七。
- 【註二六一】：顧文璧等，〈寧波現存日本國太宰府博多津華僑刻石之研究〉，《文物》一九八五年七期，頁二六—三一。
- 【註二六二】：龜井明德，〈綱首、綱司、綱の異同について〉，同【註二〇】引書收，頁二〇—一一五。
- 【註二六三】：廖大珂，〈略論宋元時期的綱首〉，《海交史研究》一九九三年二期，頁五一—一。
- 【註二六四】：有關該一專題的研究論述頗多，近年來的成果可參見《貿易陶磁研究》二二號（一九九二）之〈陶磁器——モデルとコピーの視点から〉專集所收諸論文。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日本出土的唐宋時代陶器》專題研究計劃之部分成果）

圖版文獻出處

- 圖一 《よみがえる奈良 平城京》頁二六，一九七八。
- 圖二 《世界陶磁全集》十二卷，圖版七，一九七六。
- 圖三 《唐磁》圖版二〇，一九八八。
- 圖四 龜井明德氏攝。
- 圖五 《考古學ジャーナル》一九六號，一九八一。
- 圖六 《貿易陶磁》圖版三五，一九九三。
- 圖七 《大宰府史跡》圖版五四之九七，一九八七。
- 圖八 《貿易陶磁》圖版五，一九九三。
- 圖九 同上書圖版七三。
- 圖一〇 同上書圖版三三。
- 圖一一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圖版七，一九九五。
- 圖一二 同上書圖版一三。
- 圖一三 同上書圖版一四。
- 圖一四 《古代文化》三四卷一期，圖版一一，一九八二。
- 圖一五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圖版一五，一九九五。
- 圖一六 《九州考古學》五八號，插圖二，一九八三。

圖一七 《考古學ジャーナル》一九六號，一九八一。

圖一八 《圖録櫃原市の文化財》頁八五右下圖，一九九五。

圖一九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圖一六七，一九七八。

圖二〇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圖四三，一九九五。

圖二一 同上書，圖三二。

圖二二 《はるかなる陶磁の海路展》圖八六，一九九三。

圖二三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圖三四，一九九五。

圖二四 同上書，圖三九。

圖二五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圖一六，一九七八。

圖二六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圖二〇，一九九五。

圖二七 同上書，圖五八。

圖二八 《九州の中國陶磁》圖一五，一九八六。

圖二九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圖三五，一九七八。

圖三〇 《日本人が好んだ中國陶磁》圖二九，一九九一。

圖三一 《經塚遺寶》圖二二三，一九七七。

圖三二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圖三一，一九七八。

圖三三 同上書，圖二九。

圖三四 《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圖六二，一九九五。

國立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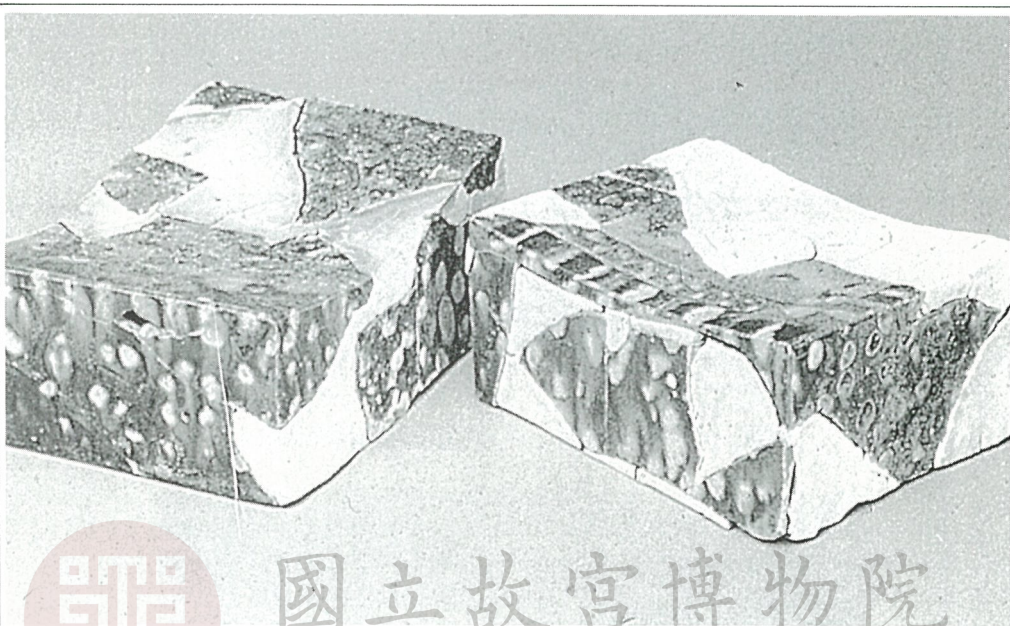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三卷 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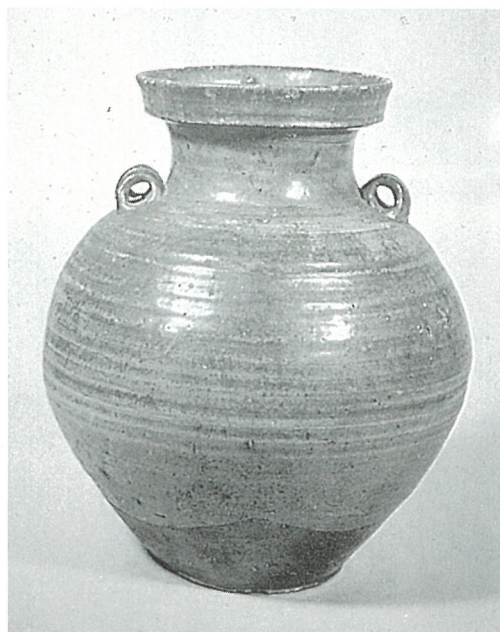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一 唐三彩枕 奈良大安寺講堂跡出土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二 唐 青瓷盤口四繫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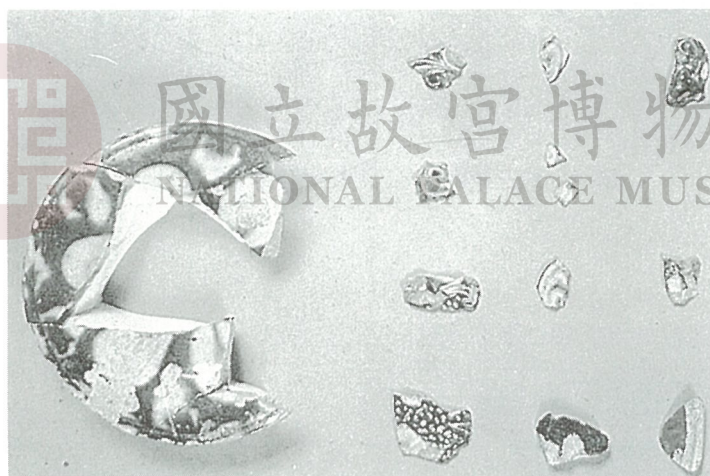
奈良法隆寺傳世（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



圖三 唐 白瓷滴足硯
道明寺天滿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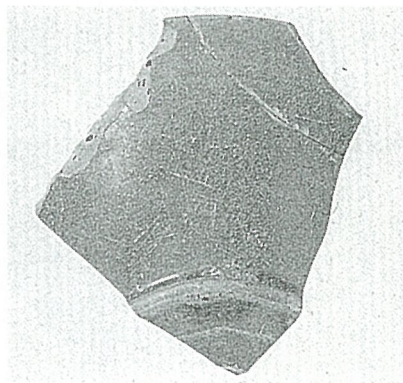
圖四 唐三彩印花鉢 三重縣繩生廢寺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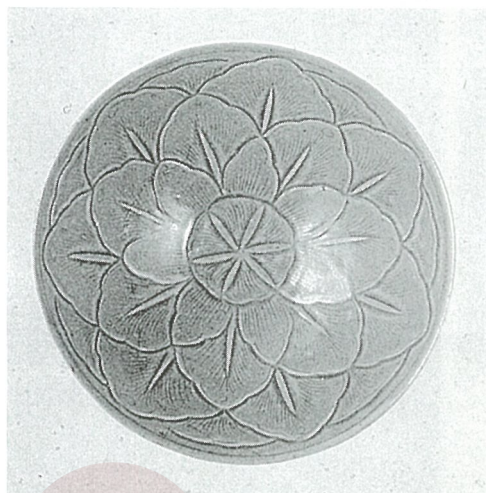
圖五 唐三彩長頸瓶殘片 福岡縣宗像郡沖ノ島祭祀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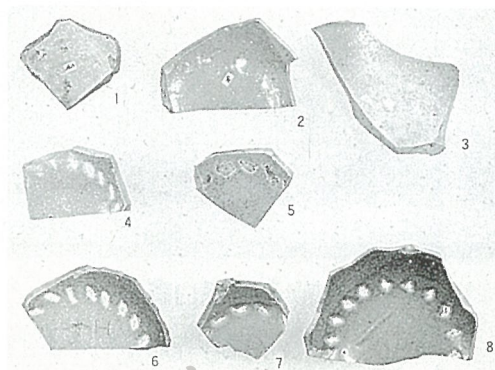
圖六 唐三彩蓋硯 奈良御坊山三號墓出土



圖七 唐 越窯青瓷殘片 大宰府政廳後背地遺跡 (SX2999) 出土



圖八 五代～北宋越窯青瓷碗
大宰府鴻臚館跡出土



圖九 唐 越窯青瓷殘片
大宰府鴻臚館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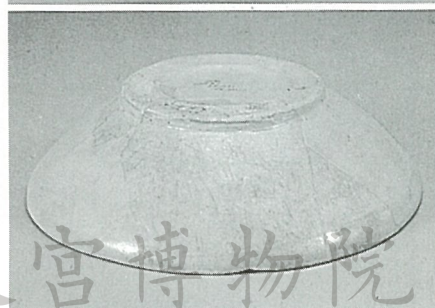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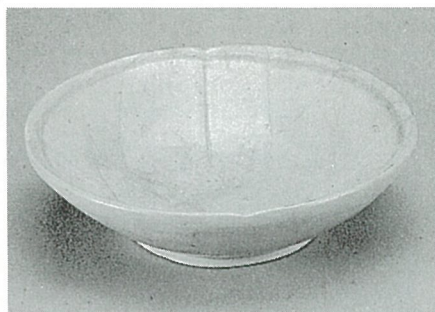
圖一〇 唐 青瓷褐斑壺
紫筑野市大門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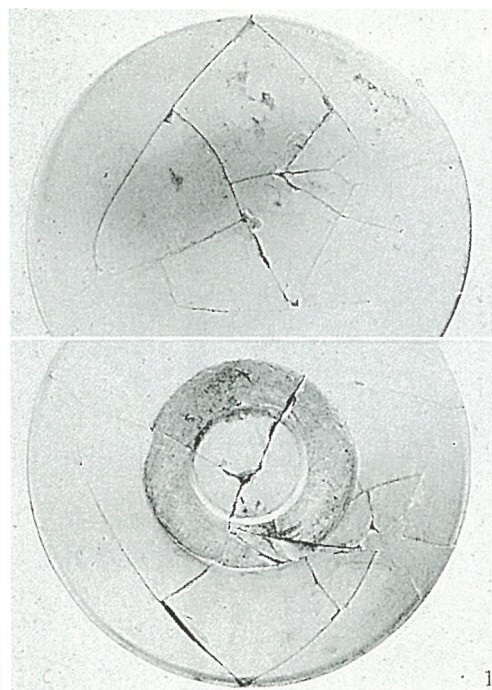
圖一一 唐 青瓷盒
京都御室仁和寺圓堂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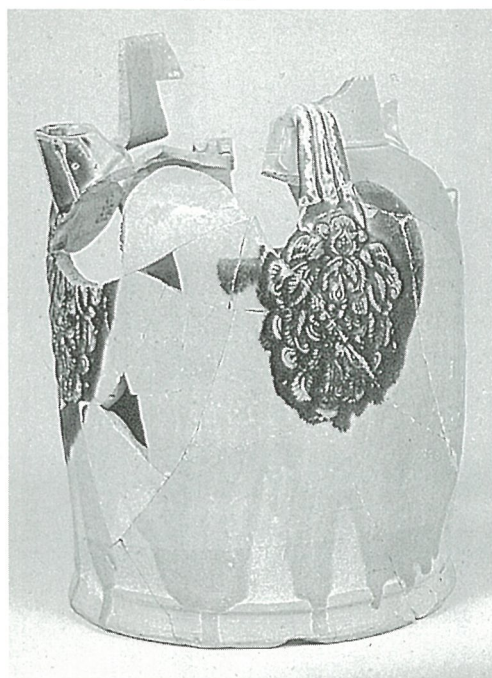
圖一二 唐 邢窯系白瓷碗
奈良市藥師寺西僧坊跡出土



圖一三 唐 白瓷碗
京都市中京區西ノ京北小路町出土



圖一四 唐 邢窯系白瓷碗
平安京西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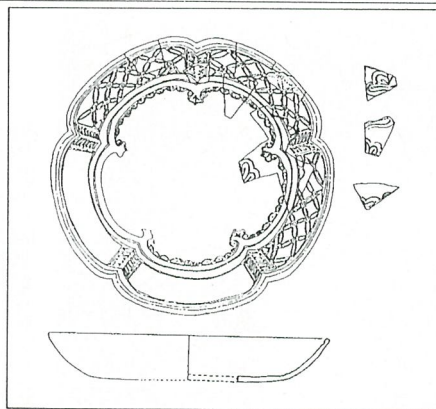


圖一五 唐 長沙窯青釉褐斑壺
石川縣小松市淨水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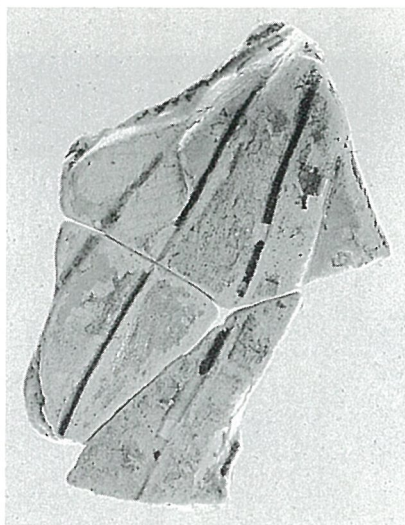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一六 晚唐三彩印花紋盤
福岡市柏原M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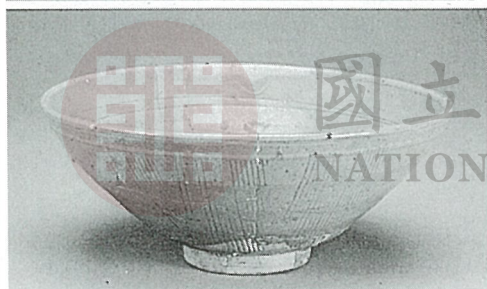
圖一七
唐 黃釉絞胎枕
奈良大安寺跡出土



圖一八 唐三彩俑殘片
奈良市藤原京遺址出土



圖一九 北宋 龍泉窯劃花紋碗 廣島縣
福山寺草戸千軒町遺跡出土



圖二〇 南宋 福建窯系青瓷劃花紋碗
京都市下京區常葉町出土



圖二一 宋 福建窯系黃釉褐彩龍紋鉢
福岡市博多遺跡出土



圖二二 南宋 吉州窯蛋斑釉盞 福岡市博多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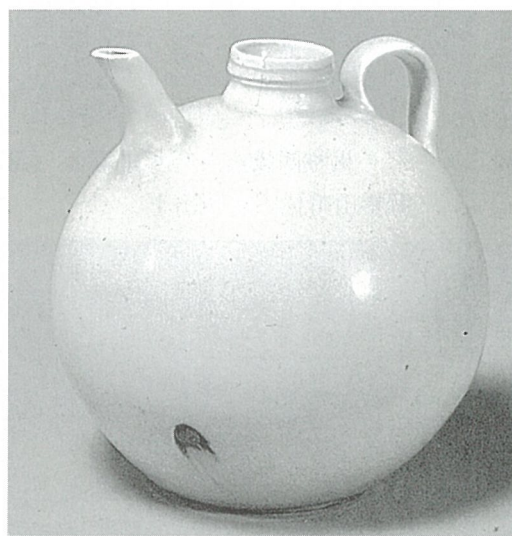
圖二三 宋 綠釉黑地唐草紋梅瓶
福岡市博多遺跡出土



圖二四 北宋 磁州窯綠釉刻花瓶殘片
滋賀縣大津市上仰木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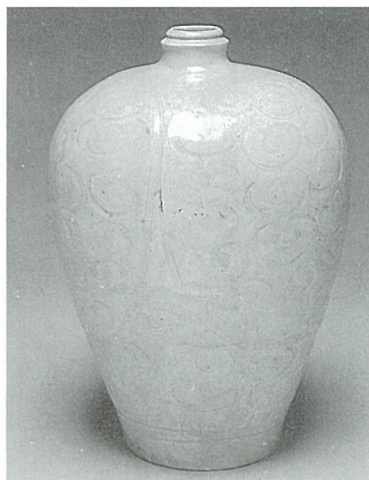


圖二五 宋 白瓷四繫罐 松山市石手町經塚出土



圖二六 宋 青白瓷水注
福岡縣大宰府市觀世音寺南出土

圖二七 南宋~元初 青白瓷梅瓶
廣島縣福山寺草戸千軒町
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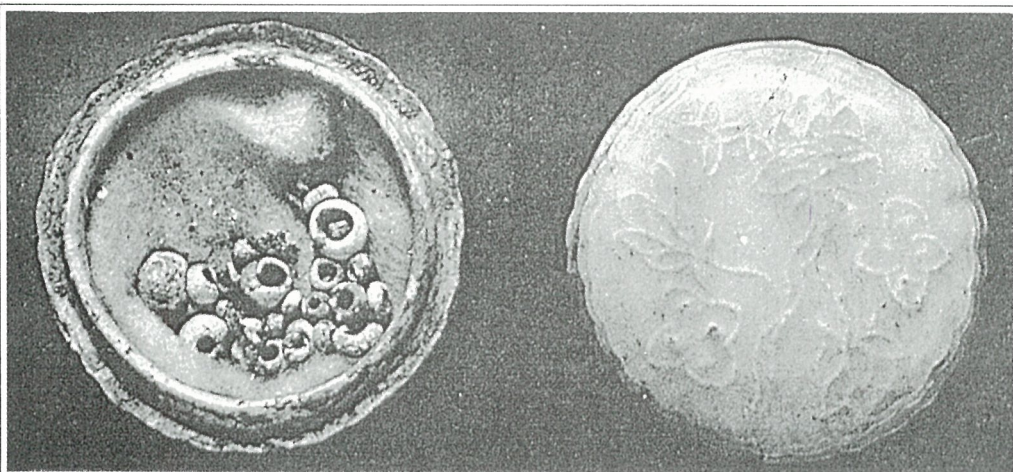


圖二八 宋 褐釉四繫壺及紀年銅經筒 福岡
縣勝山町松田經塚出土

圖二九 宋 褐釉四繫壺 佐賀縣
鹿島市片山第一經塚出土



圖三〇 宋 青白瓷盒、蓋罐、碟 京都市花背經塚出土



圖三一 宋 青白瓷印花盒 三重縣伊勢市朝熊山經塚出土



圖三二 宋 青瓷經筒
福岡縣宇美町四王寺山經塚出土

圖三三 宋 白瓷經筒
(伝)和歌山縣海南市經塚出土



圖三四 宋 黑、褐釉碗 福岡市博多遺跡出土

T'ang and Sung Dynasty Ceramics Unearthed in Japan and Related Issues

Ming-liang Hsie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ins by investigating China's ceramic wares recently unearthed by archaeologists from Japan's historical sites. It is believed that by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Japan had already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China's ceramics. By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h century, Japan had already imported large quantities of T'ang *san-ts'ai* wares. From the study of both China's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documentary records,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variety of T'ang *san-ts'ai* wares unearthed in Japan probably originated from the same main source where the Japanese acquired other goods and resources, which was Yang-chou, where many kinds of commercial ceramic products were gathered. Moreover, it is believed that T'ang *san-ts'ai* wares were one of China's earliest traded ceramics. Ceramic wares unearthed in Japan dating to the late T'ang period (ninth century), are mainly celadon wares (green wares) from Yüeh kilns in Chechiang province, porcelain from northern kilns, and wares from the Ch'ang-sha kilns in Hunan province. Among these, celadon wares from the Yüeh kilns were mainly exported via Ming-chou, while ch'ang-sha wares and porcelain from northern kilns generally went through the port at Yang-chou. Although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Ch'ang-sha kilns have been discovered around Yang-chou, and, as a whole, the variety of ceramics from the late T'ang period was still closely bound up with Japan's trade through ports, surprisingly the number of ch'ang-sha wares found in Japan is small. From this it may be inferred that, apart from the small number being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wares available at Ch'ang-sha kilns, it reflects Japan already displayed a preference for certain wares. Furthermore, Japan's tastes in ceramics changed and became more apparent over time. By as late as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lfth century, Japan had already begun importing made-to-order wares from China that suited their requirements. However, these specially ordered wares were limited in variety

and number, for they still continued to import from neighbouring ports, China's ordinary wares in large numbers, while also still remaining selective of the available types from these kilns. Interestingly, some wares were used by the Japanes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at employed in China, while other wares were used in ways that differed from their original purpose, giving them an alternative symbolic meaning that they didn't possess in China.

Keywords: Trade Ceramics 貿易瓷

Kyozuka (sūtra-mound) 經塚

T'ang San-ts'ai Ware 唐三彩

Yüeh Ware 越窯

Xing Ware 邢窯

Ch'ang-sha Ware 長沙窯

Mei-p'ing 梅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The author's summary was translated by Veronica de Jong.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八五 through 一四〇.